

下

弁

陝北之行

求知出版社印行

弁言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一行二十一人，內本國記者九人，外國記者六人，政府派遣之領隊及服務人員六人，係於卅三年五月十七日由重慶出發，七月二十五日大部份返回陪都，全程八九千里，歷時凡七十日，陝北「邊區」爲此行的主要目標，自五月三十一日至七月十二日，在道「邊區」的東南角上，以涼水崖爲起點，延安爲中心，順村爲終點，足足旅行了四十三天，此次西北之行的交通工具從最進步之飛機，火車，汽車，而至最古老方式之代步牲畜馬和驢，參觀的地方有新式都市，也有古趣盎然的窯洞。各記者於返渝後，均有佳作以記其詳，茲特輯錄有關「邊區」之作，彙成小冊，用備關心陝北者之參考。

編者附誌九月

陝北之行目錄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攝影

弁言

延安視察的感想

十年來中共幾點改變

陝甘寧邊區人民的負擔

陝甘寧邊區的經濟金融與財政

三三制與一攬子會

「保衛邊區」的游擊部隊

編者

大公報社評

大公報特派員 孔昭愷

大公報特派員 孔昭愷

大公報特派員 孔昭愷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 文伯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 文伯

下

目錄

陝北之行

二

延安觀感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張文伯

記者在延安

掃蕩報記者謝爽秋

「此間沒有社會生活」

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趙炳煊

毛澤東會見記

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趙炳煊

所謂陝甘甯邊區

國民公報記者周本淵

西行漫談

商務日報記者金東平

延安散記

新民報趙超構

從十八集團軍談起說到中共土地政策

盟利社興集特派記者迪訊

陝北歸客談「邊區」

盟利通訊社特輯

未能與老百姓談話

盟利通訊社特輯

延安視察的感想

重慶大公報八月五日社評

中外記者西北考察團的西北之行，是由外國記者所發動，主要動機是在看延安，中國記者會同前往，本報也有特派員參加。現在考察歸來，重慶各報都在陸續發表視察報告。本報特派員的報告，關於延安的部分截至今天大致已告段落。記者團在陝北盤旋四十三天，時間雖不算太短，所看到的當然有限，視察所得，仍不過是走馬看花。縱然如此，在報上發表的仍非所看到的全部。爲什麼？因爲我們並非有閒必錄，也非有見必錄，除了所已發表者外，還有若干部分的保留，是我們不願報告，或不能報告。我們相信讀者都一定很注意各報的視察報告；讀者讀了作何感想，我們不知道，我們願把大公報的感想敬述如下：

延安視察的感想

陝北之行

(一) 當前的世界大戰，是民主與軸心主義是民主，中國率先抵抗軸心的侵略，中國憲政，而中國共產黨也是標揭民主，爭取民前途是民主，中國政府及朝野兩大黨也都在神經中樞，延安的一切，雖不足包括中共的安，所見所聞，凡所設施，一切主張，都具共尤其注重黨性的增強，一股強烈的黨性，切。在黨言黨，言誠然無可批評，而在黨性有些問題。所謂增強黨性，相對的就是減持一切。民主政治植基於自由主義，民主重個性。一般民主國家也有黨，但那種黨管競爭，黨與黨間彼此尊重對方，黨內也

上，看我們國內的黨的問題，總覺還應該更向民主的方向努力。民主是尊重人性的，坦率一句話，與其增強黨性，何如增強人性。

(二) 中國今日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必須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中國的國民革命，非統一不能完成；中國當前的抗戰，非統一不能獲勝，中國今後之建國，也非統一不能成功。這一切，都植基於國家的統一，所以我們必堅持擁護國家統一，而反對任何形式之分裂。當今的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這個政府與這位領袖，是提攜全國統一象徵全國統一的國家中心。這個國家中心，異常珍貴，乃是國家受了三十多年的苦難，人民流了無量的血纔培植成的。我們以純國民的心情，考慮國家的利益，只有繼續培植這個國家中心，讓這個國家中心，使之進步，使之加強，以提攜全國，領導全國，使國家走上抗勝建成的富強康樂之域。這是最可能的路，也可以說是唯一之路。我們絕不能也不忍想像傾覆了這個國家中心，再使國家受幾十年苦難，再使人民流無量的血，然後再另外樹立起一個中心。現在國家經過七年抗戰，人民受極大災難，將士拚極多熱血，使國家獲得解放之機，與列

強立於平等地位，都是在國民政府及蔣委員長之領導之下獲致的；我們要繼續最後勝利，要戰後和平迴旋於世界舞台，要努力建設成爲現代化的國家，這個中心是國家的絕對需要，推翻此中心，另建一中心，必致國家再陷於半殖民地的地位。抗戰的確已勝利在望，我們應該再努力，更進步，却必不可自亂步驟，以遺憾國家地位已甚高，必要善爲保持，在這個中心領導之下，就極可能達到勝利。現今世事爲喻，中國不需要做南斯拉夫，也不必更有狄托其人。我們擁護國家愛護國家中心，政府若有缺點，應該促其改善，政府若有失政，應該促其糾正，輕謀另起爐竈。

（三）論國家內政，在法律上及道理上，國民政府皆權威堅強，因爲任何政府絕不許另有一個政府與它對立，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也絕不許另有一個權力與它對抗。所以中央所主張的軍令政令統一，實屬天經地義，無人能加否認。國民的立場，絕對擁護軍令政令統一，而同時也衷心擁護國民政府更增強其道。

話怎講？所謂政治，依國父的解釋，是管理衆人之事。政府執掌政權，管理衆人的事，其天然的職分，是必須要把握衆人的事管好，要能給人民解決問題。行政有效，政治清明，治軍結實，執法公平，這都是一個政府在職分及道德上所必須努力做到的。這正如前節所陳，我們擁護政府，同時也極擁護政府改正缺點，多求進步，努力把國家的事管好。

（四）我們視察延安，其心情實與同行的外國記者或其他人不同，因為我們與延安並非不相干的陌路人。延安是中國的地方，中共黨人是我們的同胞，我們以中國人看中國地方，看中國人，其好其壞，入目銘心，都非不相干的鑑賞。親切的說，我們所見到的延安一切，假使其中有若干事物是壞的，則我們絕不下意識的稱快，且毋寧以關切的心情，而引以為痛；因為假使延安有壞事，中共有錯誤，那也正是中國一部分的損失。同樣的，凡是我們看到的延安進步情況，中共的努力成績，我們也毫不嫉妒，更毋寧以喜悅的心情，而引以為慰；因為這些進步與成績畢竟是中國人幹出來的，那就是中國一部分的力量。凡是中國的力量，都必拿來作為抗戰與建國之用。我們擁護國家統一，主張黨派團結，就

是根據這種心情，而也正符合國家的利益與需要。因此，我們願特別強調擁護統一，呼籲團結！

(五)記者團在赴延安的路上及在延安的所聞所見，顯然可知在那裏存在著一種政治距離，橫亘着一個中共問題。無可諱言，這現象是使政治發生相斲的作用，而影響了國家的力量。看到這現象，人人都自然會追問一點，就是：這問題畢竟能不能解決呢？我們的答案是：當然可能，且必須可能。十一中全會早有「政治解決」的決議，這決議是極端正確的，只可惜決議後一年多的時間很少實際推進這決議。現在就正是時機，林祖涵先生尙在重慶，中外記者團的訪問延安也應該收到一些好影響。開誠心，佈公道，在國家的共同利益上，有什麼不可以政治解決的問題呢？所謂政治解決，並不是一句空話，正有其實現之道，就是——民主憲政。完成民主，實施憲政，各黨合法競爭，則黨的地位自然解決；軍隊國家化，軍隊問題也自然解決。這兩大難題解決了，則統一與團結必可無所缺憾。若謂完成民主實施憲政非可嘔嗟立辦，則現在加強民主，速籌憲政，也正可加速促進政治解

決，自宜傾誠進行。民主是世界的潮流，也的確是建設國家發揮國力的有效政治。譬如美國，她的民族多麼複雜，黨派也甚紛歧，就靠民主統一了國家，團結了人民，生產力高，打仗力強，儼然成了聯合國家的領袖。再如英國，猝遇強敵，迭遭挫敗，國勢岌岌，危險萬分，她也依靠民主，團結全國，生產的生產，打仗的打仗，卒能轉危為安，把握勝利。這兩個例子，就懍够了。總之一句話，民主是世界之路，也是中國之路！

陝北之行

十年來中共幾點

記者留延期間，七月一日那天，中共紀道二十三年大致可分為兩個時期。前十三年一個時期，主要活動地區是陝甘寧邊區。民離開了江西，特別選擇雙十節日作為出發的入陝甘寧邊區。共產黨人臆稱的「二萬五千里會合了劉志丹（已故）高崗組織的「工農山嶺嶺，便是泥沼草原，流離困苦，可想而知一日發出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發生，震動中外，最後領袖安然歸返南京，事變獲得國人滿意的解決。

中共主持下的陝甘寧邊區，其初期的軍政措施，與江西時期比較，並沒有兩樣：政治的組織仍稱蘇維埃，軍隊仍稱紅軍，若干土地沒收分配了，凋敝的陝甘寧邊區農村社會發生了變化，若干地主逃亡了，也有若干貧苦農民分得土地，那個變化中有喜有悲，刺激是很大的。

二十六年抗戰軍興，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戰。紅軍正式改稱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由軍委會轄制。蘇維埃區先改為特區，繼改為陝甘寧邊區。還有一項重大變革就是土地政策停止實行沒收的辦法。此一措施，二十五年便已有準備，而於二十六年宣言後實行。在土地已經分配區域保證一切取得土地的農民之私有土地制，同時歡迎逃亡的地主回鄉，給以耕種必需的土地與農房，可是不能再算前賬。未經沒收土地區域（如綏德，鬱縣，慶陽三縣），保證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及地主的債權。二十九年其實行二五減租，取消貧苦農民欠付地主的大部地租，並將餘欠減息，農民則必須交租交息。

地主一方面的感覺，究比沒收好得多，幾世不得翻身的貧苦農民如釋重負，生產情形因之提高。近年陝甘寧邊區農業生產之進展，中共溫和的行使土地政策當然是個關鍵。

中共某負責人士對於前期的土地政策不承認有什麼錯誤，而解釋目前溫和的辦法是：「怕地主跑到日本人那裏，引日本人來。」那裏戰後以及未來中共土地政策如何呢？中共某負責人士對此曾表示：「如果地主手持兩刀，天天殺人，則非沒收他的土地不行。如果地主與農民關係緩和，則絕不能沒收土地。普遍的減租減息交租交息，可以使地主與農民關係緩和下來。」他並且申明中共始終抱有「耕者有其田」的理想，他認為：「土地問題一定要徹底解決，不問那一黨願意不願意。」他說：「不妨試試看，在減租減息交租交息之後，將農業資本轉變為工業資本，同時由政府貸款農民購買土地。」最後他聲明：「中共尚未做此項決定，將來是否這樣做也沒有定；但是解決土地問題，是否應該採取對比溫和的辦法，是值得考慮的」。

中共社會政策之新措施，不限於土地一方面。在工人方面，提高工人生活是一貫的，

陝甘寧邊區工人待遇比較一般工作人員高；但是工作時間現在是十小時，較共產主義的全
部民主革命政綱中的八小時工作制增加了兩小時。陝甘寧邊區政府對記者團發表的「建設
簡述」中說明這一點是「使資本家有利可圖」；公私工業盡在扶植之列，公私商業也任其
發展。

經驗與環境促成中共在政策上之若干改變。

陝甘寧邊區人民的負擔

大公報特派員孔昭愷

甘陝寧邊區是個農村社會，那裏農民在捐稅上的負擔，就記者所知主要的是農業稅，大部分地方徵「救國公糧」，一小部分地方正試辦「農業統一累進稅」。

邊區政府財政廳長南漢宸氏對記者團發表：「救國公糧是由上攤下去的，帶有一種捐的性質。七年來由少增多，復由多減少，可以說明邊區生產發展情形。計二十七年徵一萬石（小米），二十八年五萬石，二十九年九萬石，三十年二十萬石，三十一年十六萬石，三十二年十八萬石，三十三年十六萬石。救國公糧按農業收益徵收，從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五不等，抗戰軍人家屬及收穫僅敷個人食用無力繳糧者免徵。免徵者佔全邊區人口百分之二十。邊區人民救國公糧平均的負擔佔收益百分之十四，免徵的人數計算在內。」

「救國公糧」本身仍存在不少缺陷，主要的是勤勞「得與不勞而獲同樣只繳收益稅，而不計算其土地財產稅，因之邊區去年決定實施徵收「農業統一累進稅」，先在延安，綏德，慶陽三縣試行。

「農業統一累進稅試行條例」內容要點如下：●就人民之土地與收入合併徵收，並應戰時之需要，得以糧食馬草二種形式分別徵收之。●徵收範圍：甲、凡已耕或可耕之土地均須徵收土地財產稅。左列土地免徵土地財產稅：一、墳墓地及荒地荒山荒灘無法開墾者；二、森林、畜牧地；三、居住之房基地；四、移難民新開荒地由政府規定之免徵期以內者。乙、各種收入之徵收依左列規定：一、各種各種收入徵稅：土地耕種所得之農產品，農村副業之收入，地租房租及畜租之所得，運輸業之收入，牧畜業之收入，森林藥材之收入，未納商業稅之臨時經營事業收入。二、左列各種收入免稅：農村中罷工或工或調份子所得之工資與工粟；救職員之米貼，貧苦抗工直系親屬及因失去勞動力退職退伍人員之收入，課券派種老幼殘廢無所依靠僅能維持其生活之收入；移難民免稅期內農產品之

收入；部隊機關學校民衆團體之收入，紡織業及運輸業內運糧部分之收入；其他經政府特許免稅之收入。②計稅標準：(甲)以公斗爲計稅單位。(乙)土地財產稅以土地常年產量爲計稅標準，以常年產量百分之十五爲稅本，(出租之地，其稅本最高不能超過租額百分之五十)。(丙)各種收益稅本依左列計算：一、農業收益以常年產量計稅；自耕地應減常年產量百分之十五作生產消耗，佃耕地(除減去生產消耗外，並減地租計稅)。二、農村副業及運輸業以純利八折，牧畜業以市價六折折糧計稅。三、地租房租及畜租之所得，森林藥材之收入，未納商業稅之臨時經營事業收入以實收入折糧計稅。③起徵點：綏德分區以五斗起徵，起徵率百分之三；延屬分區三邊分區及隴東分區之華池環縣以六斗起徵，起徵率爲百分之四；隴中分區及隴東分區除華池環縣外均以八斗起徵，起徵率爲百分之六。各地農戶每人不足以上規定者免徵。以戶爲徵收單位，以每人平均糧數爲計算標準。累進稅最高率至百分之三十五。④計算與徵收，調查與審議辦法從略。

延安，綏德，慶陽三縣改徵農業統一累進稅的結果，根據邊區政府財廳發表的統計；

一地主階層負擔佔其收益百分之三十六點五，至三十七點九；富農階層為百分之十八點九四至三十三點二；富裕中農為百分之十三點五九至二十七點二；中農為百分之九點一五至二十點四；貧農百分之四點八五至十一點二；僱農（帶耘自己一部分土地）為百分之三點二至五點七。貧苦抗屬工屬全部免徵，移難民不滿三年者，不論其收益多寡一律不負租。地主與富農階層的負擔比較過去公糧提高了；地主最高增加百分之二點九，富農最高增加百分之三點二。其他各階層的負擔相當降低了：富裕中農較前降低百分之二點八，中農一般維持過去狀態，貧農降低百分之零點八，僱農降低百分之二點七。邊區今年將續推三縣推行農業統一累進稅。

據南渡農氏談，去年邊區還徵收公草一千八百萬斤。

邊區人民及其牲口一年為公家之服役，據發表計有三種：(一)公糧運輸：最遠不過五十里。民國三十一年邊區勸員人民運糧一萬五千石，里程平均每石一八七里，如一次運完須三萬七千五百個牲口。去年運一萬三千七百三十七石，里程平均每石一〇六點四里，

一次運完須三萬一千六百二十二個牲口。公鹽運輸：前年共運十二萬馱，（一百五十斤一馱，一斤合二十四兩），去年十萬馱，今年計畫八萬五千馱。交鹽時每馱以一百零五斤計算，四十五斤給運輸人作運輸費。臨時動員：其工作為擔架，修路，挖築窖洞等。前年動員六四九二三人，去年四五六四三人。前年全邊區人民服勞役平均每人為一個工的零九，不足一個工，去年平均為點六，半個多工。」

在「擁軍」口號下，人民幫助了軍隊，邊區政府公布「三十二年人民幫助駐軍統計」為：「●調劑：熟地二〇、三七七畝，種籽一三三石，農具三、〇四二件，窖洞一、三八七孔，糧一六〇石，邊幣一〇〇、〇〇〇元，用具八、〇六七件，牛車三二輛。●慰勞：邊幣一三、三一五、一八九元，豬羊雞七、八八〇頭，食品九五五、七〇二斤，糧五七、九二六石，柴炭一、七四七、五一四斤，草九四、八八五斤，幫牛工二二八個，牲口五頭，文具三，七九二件，藥材二、〇〇九斤，衣服七十套，鞋襪一八八、八九七雙。」這相當大的數目字，雖然不是邊區人民絕對的負擔，不過至少可以計算在去年開銷之內的。

陝甘甯邊區的經濟金融與財政

大公報特派員孔昭愷

陝甘寧邊區有私人商業，也有公營商業。公家經營商業的有機關，部隊，學校。毛澤東先生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書中說：「我們的經營商業是從合作社開始的。一九三九年各機關學校就有消費合作社，並有開飲食店的。至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共有三十個合作社及食堂，資金共六萬餘元。目的在於供給本機關學校的日用品，同時賣給外面，謀些微之利，藉以改善生活。」一九四〇年冬，財政困難達於極點，為渡過難關，從一九四〇年冬到一九四一年春，先後由政府支付七十萬元，銀行借出三百萬元，作為各部門增加的生產資金，交給各生產自給的領導機關轉發下去，加上自己積累的資金，於是決定以工商業為主要經營方向，農業則放在輔助地位。」可以看出陝甘寧邊區公家經商之起因。

邊區貿易公司經理葉季莊談：「公商無妨私商之發展。延安、綏德、鄜縣、臨鎮、隴東、定邊計有公營商店一九九家，私人商店二五七九家。私人商店逐年增加，如延安之私人商店，二十五年一二三家，二十六年一五〇家，二十七年二二二家，二十八年二四六家，二十九年二八六家，三十年三五五家，三十一年三七〇家，三十二年四五五家，三十三年四七三家。」財政廳長南漢宸氏稱：「公私商店一律須納商業稅，二十九年開始徵收，每年徵收兩次，由地方政府商會等合組之稅務委員會辦理。徵稅之前，由會調查決定徵收多少，再由大小商人合組評議會作最後決定，即根據最後決定之數額徵收。商業稅比農業稅輕，去年商業稅佔商業純收益百分之十三。」

陝甘寧邊區流通的貨幣叫「邊幣」，是陝甘寧邊區銀行發行的。該行經理賈亞光氏稱：「邊幣保證金爲百分之五十，有股票、金銀及法幣。」「法幣邊幣之兌換，即法幣由一萬元起兌換邊幣，邊幣由八萬元起兌換法幣，要經商會保證，地方政府批准，銀行才能

承兌。」邊幣是民國三十年二月十八日發行的。最初與法幣的比價是一元四五個一元法幣，由於需要外邊物資的關係，比價日高，去年七月後波動最烈，由四五元一直漲到十元換一元法幣。今年漸漸穩定下來，現在八九半換一元法幣。」

大規模發展農工商業的結果，陝甘寧邊區資財加厚，游資加多。爲了吸收游資，邊區銀行在三十年三十一年發行過「儲蓄券」失败了，現在採取信用合作辦法，就合作社的組織，加以吸收。據黃亞光氏稱：「去年二月試辦，到今年二月，僅延安兩區信用合作社，即以邊幣八萬股金吸收人民存款五百七十九萬。」

陝甘寧邊區的合作社，機關裏有，部隊裏有，學校裏有，團體裏有，民間也有，但是民間合作社是「民辦官助」。民間合作社誘導老百姓入股是很有辦法的。他們利用物價高漲的關係，使老百姓得到相當厚的利益，合作社本身資產越積越厚，一天天的發展。如同「公糧入股」，就是農民以明年應繳之款國公糧提前交與合作社，一方面入股生利，一方

而明年的救國公糧就由合作社代繳了。在初期，合作社因為分配的利息相當大，公積不下多少基金，但是時間久了，入股多了，規模也就大了。據邊區政府公布從二十六年起到今年邊區合作社發展的概況：「二十六年一四二社，社員五七、八四七人，股金五五、二二五元邊幣；今年二月計六三四社，社員一八二、八七八人，股金七三三、九九八、四〇三元邊幣。六三四社中計消費合作社二八一個，生產合作社一一四個，運輸合作社二二三個，信用合作社六個。」詳細分門別類的業務達二十三項之多，邊區合作社不僅經營消費事業，還在經營供銷，運輸、生產、借貸種種事業。

邊區財政廳長南漢宸氏說：「退股是自由的，什麼時候要，什麼時候可以拿出來。」不過就「公糧入股」及其類似情形的入股來說，除非將特定的利益取消，否則退股殆必有相當的時間限制。

黃亞光氏說：「游資不走向銀行或合作社而流入社會的情形仍相當存在。」

陝甘寧邊區財政現況，據南漢宸氏稱：「年去財政上有虧空。對外貿易不平衡，物價高漲，影響財政。」「去年開支，除公糧公草外，財政開支六十萬萬邊幣，由生產自給百分之六十四，由財政補助百分之三十六。開支的比例軍費佔百分之四十五。」「去年的虧空，是向銀行借政府方面全部收入之百分之十八來彌補的。」「今年的開支估計比去年要增加百分之三十，生產自給今年提高，要超過去年的百分之六十四，只軍隊就要產額十萬石，如此財政補助可能較去年比例減少。」

三三制與一攬子會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文仲

中共現階段所標舉的是「新民主主義」，稱權力所及之地為「抗日民主九四一年西北局發布的五一施政綱領裏，又有「三三制」的號召，本以進行政府的選舉。我們這次在陝北，到處可以聽得「民主」的呼聲，特別是黨政們往往把一切國內的問題歸納到民主問題。因此，我們爲要了解「邊區」，「主」與生產運動等最齊觀。關於民主的理論，另節論述，這裏就想以「三三一究其實施的情形。

所謂「三三制」者，就是「各級參議會，常駐委員會與政府委員會，權力機關，共產黨人約束自己只佔三分之一，讓其他三分之二，屬於各階級之

中變成抗日與民主的非共產黨人士。共產黨責成自己的黨員選舉他們，並宣傳羣衆選舉他們，選舉結果，選有共產黨人超過三分之一時，大多以辭職辦法退至三分之一。」（陝甘寧邊區建設簡述）

現在「邊區」各級政權的權力機關，據稱都是民選的，（事實上恐有例外，如我們經過西臨縣時，據縣長曹九德稱，原任縣長選出後「因病休養」，政府派他來代理，迄已一年四個月，他本身是入黨已十餘年的共產黨員）其間被選出人員的黨派關係如何？外界不易瞭然。在「邊區政府」所主辦的生產展覽會裏，也只有下列幾張關於黨派關係的統計：

（一）邊區參議會：參議員二九二人；常駐議員九人，內共黨三人；政府委員十八人，內共黨六人。

（二）三十年慶陽、合水、綏德、新寧、鎮原等五縣參議會：共黨佔百分之三一。

三、「國民黨」佔百分之二三。四，無黨派佔百分之四五。三。

（三）三十年慶陽、合水、綏德、新寧、鞏縣、鎮原等六縣參議會常駐委員：共黨佔

陝北之行

百分之三七·二，「國民黨」佔百分之二

(四)三十年以上六縣政府委員：共

○·六，無黨派佔百分之三五·六。

整個「邊區」共有三十縣一市，劃為

統計者，止鄜縣一縣。綏德分區轄清澗縣

淳耀等四縣，見於上項統計者，止新寧一

縣，三邊分區轄定邊等四縣，並無一縣

「三三制」已普遍推行，是不夠的。再如

「一。』(陝甘寧邊區建設簡述)邊區參議

院佔二分之一。又據高崗及「邊府」民

統計表上所列國民黨員所佔成分，值得

問，「邊區參議會」是「邊區」政權的

副主席，政府委員，都要從這裏選舉產生。共黨既佔二分之一，則所謂「三三制」者，名實是不盡相符的。

我們爲要了解「邊區」各級選舉，先得說明「邊區」的政權系統。「邊區」政權分「邊區」、縣、鄉三級。「邊區」以下有專員公署，是「邊區」的代表機關；縣以下有區公署，是縣府的助理機關，這兩級的人選出自委派而非選舉。「邊區」設「邊區參議會」，選出政府委員會，及正副主席，組織「邊區政府」下設民、財、建、教四廳，保安處、辦公廳、高等法院及民族事務委員會。「縣」設縣參議會，選出縣政府委員，再由政府委員選舉縣長，組織縣政府，下設一科、二科、保安科、自衛軍大隊部及秘書和司法處。鄉設鄉參議會，選舉鄉長，組織鄉政府，下設文書及自衛軍連部。「邊區」及「縣」兩級參議會，各選常駐委員，處理日常會務，人數「邊區」爲九人，各縣五人至九人不等。政府委員，「邊區」爲十八人，各縣爲九人至十三人不等。至專員公署設專員一人，下設三科，秘書及保安分處。兩級另有高等分庭之設，由專員兼庭長，區公署設區長一人，下設助理

員及自衛軍營部，這
合爲一體，據「邊區
從上級的人民大衆的
間則所選出之政府爲
同級參議會與上級政
邊區的政制，是立法
又是緊接着黨的一元

關於各級選舉辦法

書長羅邁，廳長劉景
勵英雄等，多語焉不
舉條例」，才有些頭緒
法是這樣：

(一) 各級參議會的選舉事務，設有各級選舉委員會處理，鄉選舉委員為五人，縣七人，「邊區」九人，由各該級上級政府聘任。選舉經費，由選舉委員會造具預決算，報請「邊區」政府財政廳支付。

(二) 凡居住邊區境內的人民，只要年滿十八歲，而無賣國行為，剝奪公權，神經病等消極資格者，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選民，及取消選舉權者，由選舉委員會先事調查登記，以紅白兩色公布。

(三) 鄉參議員的選舉單位為居民小組，縣參議員的選舉單位為鄉，「邊區」參議員的選舉區域，以縣為單位。

(四) 每一居民小組，得選舉鄉參議員一人，每小組至少二十人，至多六十人，在同一鄉的居民小組，其人數相差不得超過十分之三。縣居民每四百至八百人得選舉縣參議員一人。每選居民八千人，得選舉「邊區」參議員一人，但每縣人口無論多寡，其應選議員不得多於十人少於三人。此項選舉比例的實數，由該區選舉委員會擬定。呈報上級選舉委員會批准。

陝北之行

(五)「邊區」，縣參議會選舉單位的居民一者：得選舉議員一人，其超過比額的餘數，

(六)警察、學校、工廠、機關、縣保安隊一樣。但「邊區」保安隊，駐防部隊，專門以上單位，進行其單獨選舉，選舉出席於所屬參議會的選舉比額人數時，得聯合數單位進行選舉。以上學校，百人以上產業工廠的職員，除參加甘舉。他們有雙重選舉權。

(七)少數民族如已達各級參議會選舉居民舉。不足法定人數而已達鄉或縣選舉五分之一，進行民族選舉，選出各該級參議會參議員一人，選舉，與一般居民同。又少數民族選舉，得以多

(八)各抗日政黨，抗日羣衆團體，可提出候選名單及競選政綱，進行競選運動。關於候選人的總人數，一說以當選額兩倍爲限，一說沒有限制。關於提出候選人的條件，一說鄉級每一居民小租可提出一人，一說只要有十人附議便可提出。另一說，不待他人提出，可自告奮勇，揭舉「政綱」，參加競選的。縣鄉對其參議員的候選人相當清楚，對於「邊區」參議員的候選人，則須由選舉委員會先作候選介紹，或由候選人發表政見。

(九)選舉時，不便集中在鄉來舉行，所以要在行政村或合數村開選民大會進行選舉。據邊區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稱：選舉前須先將候選名單通融，選民對於候選名單中之若干人不同意者，可隨時提議取消或改推。他又說：投票有很多故事；或就印好的候選人名單畫圈；或燒香洞；或舉拳頭；（即舉手）或投豆子入碗，碗上標明姓名；或叫候選人排成一列，每人背後各繫一碗，令選民依次就其後背投豆。得豆多者當選。（碗如放在候選人的面前，恐有礙無記名投票之故）

(十)各級政府委員由各該級參議員投票選舉。「邊府」十八委員中正副主席與其餘

十六委員，分兩次投票，正副主席候選人由參議員分小組開會提交主席團，如較規定之數額為多時，（通常為一倍以上）由大會先用舉手表決，擇定候選人，然後以無記名方式投票。

謝覺哉認為目前的選舉還有兩個缺點（一）尚無別黨公開競選，故候選人大多是共黨及民衆團體提的。（二）一部份人民對選舉不熱心，選民到達百分之九十者甚少，一般為百分之七十，最少為百分之五十。所以投票時又有一種方式，叫做「背箱子」，由選舉委員會背了箱子到各村去叫選民投票。究竟選民要到達多少，才是法定人數，並無規定。又據幾位幹部黨員稱；每次選舉，要經過相當長的宣傳醞釀時期，每次縣的選舉，自開始以至結束，至少要有半年時間，人民積極自動參加的畢竟不多，因此各級選舉委員會的權責是相當大的。它可以左右選舉的成敗。

照條例規定：鄉參議會參議員每年改選一次，縣參議會參議員，每兩年改選一次，「邊區」參議會參議員，每三年改選一次。事實上據稱因忙於生產，選舉耗時太多，故自

三十年以來，縣鄉各級參議會都還沒有實行改選。「邊區」參議會有將縣鄉參議會及其自身的任期，決議延長之權。

又據謝覺哉說：「邊區參議會裏，有日本，印度及荷印籍參議員參加，是參議會聘請的，他們沒有入中國籍，但今已將邊區畢業為事業，為抗戰服務。他們是在本國受壓迫，以邊區為故鄉，故請他們擔任參議員。」「邊區」參議會中，以日本人參加的有「森達」一人，據高崗稱已入中國籍，謝覺哉則稱是以日人資格參加。正副議長的說法不一，以外籍人士參加他國的政權機關，便有選舉並監督政府之權，確是一個創例。

關於開會情形，去年邊區縣兩級，只開了議會常駐會與政府委員會，參議會未開，只開了勞動英雄大會。今年邊區參議會已在七月裏召開。至於鄉參議會，去年開了多次，多採「一攬子」形式。所謂「一攬子」者，他是集同級政府委員，幹部及活動份子一起開聯合會議，把政府委員會參議會及其他會議，作一次舉行。我們在排莊鄉會參觀過這樣的會議，出席會議的資格無何嚴格限制，討論的是一鄉的生產及織草工作，採取談話會方式。

這種「一攬子會」一方面固可以集中人力，同時也可以削弱選舉的作用。因為一個正式選舉出來的人員與黨政或其他方面未經選舉的人員，處於同一地位，他的權限是受到影響了。但這對於上級政府之活用「民主」，倒是比較方便的。這種「一攬子會」在「邊區」認為適合三三制「民主」的最好形式，並且還要普及，縣以上也要適當的採用。「邊區」有不少制度，都是那樣富於活動性的，怎樣方便，就怎樣做。

「保衛邊區」的游擊部隊

中央日報特派記者文伯

「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邊區」是由游擊隊打出來的。

據「邊區建設簡述」說：「民國十九年劉志丹（已故）高崗同志等，在這地方發動游擊戰爭，實行土地革命。九一八事變後，創立工農抗日軍。」三十年五月「邊區」政府工作報告說：「陝北主力紅軍與游擊隊，約有二萬以上。二十四年八月，紅軍二十五軍北來。合編為十五軍團，十一月中央紅軍由吳起鎮進入蘇區，二十五年十一月紅二四方面軍又在甘肅會寧鎮原，與中央紅軍會合，陝北紅軍編入中央紅軍後，東征山西，西征甘寧，離開了陝北蘇區。為鞏固地方計，會將各地游擊隊編成獨立營游擊支隊等。西安事變後，又將地方部隊一部份編入留守兵團，其餘部份作為「陝甘寧邊區保安隊。」又說：

「保衛邊區」的游擊部隊

陝北之行

「陝甘寧邊區蘇維埃」改爲「

已擴大到「原陝西省屬的延安、

甘泉、鄜縣、延川、延長、綏德

甘肅原屬的慶陽、合水、鎮泉、

二十九年高崗曾有這樣的報

由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

西安省委派之邊區縣長。正值此

安拿辦「犯官」何紹南，一面請

黨同志乃應紳民之請，出而兼任

隴東的慶陽、合水、鎮原三縣，

選委縣長，恢復管轄。……三日

安定、保安、靖邊、定安、延川

不肯言邊區。一（同書）這裏多少道出「邊區」日益擴張的內情。我們如果以最近在陝北得到的「陝甘寧邊區地圖」與前書所載的地圖對照，「邊區」在若干邊境又壯大了些。

這由實力所造成的事實，怎樣能够合法化？是一個問題。二十九年十月十九日，何總長白副總長曾有皓代電致朱總司令，附有同年七月十六日中央提示案，其中關於「陝甘寧邊區」問題，中央最後決定是：（一）區域：為陝省之綏德、米脂、吳堡、葭縣、清澗、延安、延長、保安、安定、安塞、甘泉、富縣、及定邊、靖邊兩縣之各一部（定邊縣城不在內，靖邊縣城在內），甘省之合水、環縣及慶陽之一部（縣城在內），以上共十八縣。（二）名稱：改為「陝北行政區」，其行政機關稱為「陝北行政區公署」。（三）隸屬及管轄：「陝北行政區公署」暫隸屬行政院，但歸陝省府指導。又區內各縣由該區公署直接管轄，不再設中間機關。（四）組織：區公署設主任一人，其詳細組織由政府以命令定之，縣以下之行政機構一律不得變更。（五）政令：區內政令，一律遵照政府現行法令辦理。（六）人員：區內主任，准由朱總司令德保薦，其所轄各縣縣長，准由該區主任保薦，並

一律由政府核委之。(七)駐軍：十八集團軍在陝、甘、寧留守部隊，一律撤至該區內。這裏所提的十八縣，範圍較天水行營所提的十二縣爲廣，是儘量遷就事實的解決辦法。可惜「邊區」當局並未依循，使「邊區」始終停滯在非法的境地。

「邊區」是一個懸案。二十九年一月朱總司令等的佳電，曾說：「邊區二十三縣一案，懸而未決四年於茲」。(那時所稱二十三縣，比現在的三十縣一市爲小)又稱「懸而未決，又加封鎖，」當時何總長等即於十二月八日以齊代電答復。指出：「所謂邊區，純係兄等自由破壞地方行政系統之不法組織；中央迭經派人與兄等商洽，懇求正當解決，而每度洽商結果，均以兄等堅持特殊組織，不容中央一切政令實施於該區，體制規章，必欲獨爲風氣，更復對地域範圍爭持固執，以致迄無成議，此何得視爲懸案。且中央雖不認所謂邊區之法律地位，固始終爲抗戰大局而曲予優容，初未嘗因該軍之侵凌壓迫，而有一兵一卒相還擊，而兄等部隊則已馳突數省，軍政大員之被殘害者，已不可數計，以視兄等動輒誇大宣傳之平江事件，^①確山事件，重輕之去，何啻天淵！」最後他希望對於中央提示

案，誠意接受，因為這裏對於「邊區」已示寬大解決之道。但事實上「邊區」當局並未「接受」，而只在「請求」或「要求」。如高崗領導下之「邊區政府主席」林祖涵，於今年一月六日報告「邊區政府一年工作總結」時，最後申明「我們陝甘寧邊區繼續請求國民政府的委任，成爲不但在實際上而且在法律上都是國民政府下面的一個地方政府，以便更有效地在 蔣主席領導下進行全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略反攻，爭取偉大抗戰的最後勝利。」

中國記者這次在陝北曾以書面向「邊區政府」提出這樣的問題：邊區政府的制度，是臨時性的，還是永久性的？在何種條件下可以取消？這一問題是從政令統一的觀點出發的，後來「邊區政府」秘書長羅邁的答復很圓通，他說：臨時的抑或永久的？要看如何看法。如以爲是在實行三民主義，是由人民選舉的。從這一意義上講是永久的。如就名稱範圍上講，只要全國都實行民主政治時，可由全國人民來決定。

「邊區」的武力，可分三類，即保安隊，自衛軍和正規軍，他們都負有「保衛邊區」的責

任。「保安隊的編制，開始是按照各地遊擊隊的戰鬥能力與政治質量的高低，編成十幾個保安基幹大隊及若干縣保安隊、警衛隊、遊擊小組等。基幹大隊比縣保安隊要進步，但散漫性鄉土觀念仍很濃厚。到了二十八年上半年，才相繼改為獨立營，如直屬保安司令部的獨立營，直屬分區的獨立營，及最近由縣保安隊改編的獨立營等。獨立營的特點，就是脫離了地方性，具有常備軍的性質。」「但逃亡的總數還是很嚴重。」（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

在「邊區政府」裏，有保安處的設置，專署為分處，縣為科。工作是維持公安，檢察和防奸，據羅邁稱：「保安處所持的政策是「寬大政策」，主要在感化爭取，另一方面為鎮壓。對漢奸特務都是寬大。非至不得已時，不送法院，照刑事辦，法院亦不輕殺。」

「自衛軍以前叫赤衛軍，是不脫離生產的武裝。是主力的補充者，大多為經過革命的鍛煉的工農份子，婦女佔百分之十二。內有共產黨員百分之二十四起模範作用，武裝大多為紅櫻槍。自衛軍的特點：（一）人民自己的武裝。如果說保安隊是從人民中抽出一部份人拿武裝以保護人民，那自衛軍就是全部成年人民直接武裝以保護自己。（二）保民是由保

鄉積累起來擴大起來的，「惡龍離門地頭蛇」。(三)他們的組織最有力，成爲各種民衆組織的中堅。(四)班排連營長大多由隊員選舉，報告上級批准，萬民選制於軍事組織之中。以營爲較高單位，受各縣保安大隊部的指揮，把半武裝與全武裝聯繫起來成爲全國人民武裝化的基點，與所謂「民團」「壯丁隊」異趣。」(同前書)自衛軍中卽所謂民兵，現又有基幹自衛軍的名稱，是在自衛軍中挑選比較優秀者充當的。我們在六月十四日的聯合國大會上，曾看見紅櫻槍的陣容，他們對於服裝，步伐是不講究的。

正規軍的前身是「紅軍」，二十六年奉命改稱爲革命軍時，計有三個師的番號，卽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師，共四萬五千人。新編新四軍，另有一萬二千人。其後逐年自由擴軍，迄今「陝甘寧邊區」，據稱已集結五萬人，總數當超過原編制不少。比較擅長的戰術是游擊。

我們在陝北實地看到的部隊，是三五九旅，或許也便是十八集團軍的標準隊伍。他的屯墾及經商情形，前文已有報導，現在來談談他們的陣容和生活，據該旅旅長王震報告：

軍隊的組織成分，以籍貫講河北占百分之四十五，山西百分之三十五，其他百分之二十，以社會層講，農民占百分之六十，工人百分之二十。其他如商人，初中以上程度之學生等占百分之二十。年齡大多為自十八歲至三十五歲，其中十八至二十五歲占百分之三十，二十五至三十，占百分之五十，三十至三十五歲占百分之十五，三十五歲以上占百分之五。文化程度分三等，文盲（識一百字至五百字）占百分之二十，半文盲（五百字至一千字）占百分之四十，相通文字者，占百分之四十。在生產運動下，主要訓練，集中於冬季行之。冬季爭取五個月，生產期中爭取一個月，每年以訓練六個月為標準，訓練時間，軍事教育占百分之七十，餘為政治文化教育。軍事教育上最感困難的是：武裝之複雜而且缺乏。同時由於交通工具和馬力的缺少，後勤人員占整個部隊百分之三十，訓練上不免參差，訓練着重短距離作戰的技術，據稱現在的實際成績：步槍射擊，在一百密達內命中者，占百分之九十五；刺殺（後勤人員較差），能於一分鐘內，通過一百五十密達，超過五道障礙，投手榴彈三枚，對七個目標投刺，占百分九十六。投手榴彈全副武裝，平均紀錄為三十九密達。

我們曾參觀過兩次表演：第一次是一班人投手榴彈，行動相當活潑；第二次是試砲，兩門砲共打四發，有一發是命中的。

士兵的服裝不甚周全，槍械也很夾雜。若干日本造的槍砲，證明他們打過敵人；不少的山西造的槍砲，如與團長官的談話對照，則又暗示我們不必覆述的一段沉痛的故事。

據王震稱：該旅是本馬克斯主義唯物辯證法及唯物歷史觀教育士兵的，先搜集若干生動悲壯的故事，激發士兵的敵愾心，再進而及於抽象的政治理論。士兵們的歌詠寫作，是受得多方鼓勵的。他更提起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次幾個士兵準備逃走，偶然記起賀龍的生日，他們便鄭重地設了香案，用一塊紅布蓋在神牌上面，磕着頭說：「對不起，我們要跑了。」後來這幾個逃兵被找了回來，追問他們開小差的原因。他們說：我們當兵已多年，還沒有老婆！另一個原因：他們病了，沒有給好好照料，自此以後，朱總司令便下令：兵准接家眷。並且有結婚的同等機會。我們在九龍泉地方會觀他們官兵的家屬住所。一排八九個營洞，每一營洞住二三婦女，每一婦女在紡紗，同時都抱了一個孩子。有人說笑：

陝北之行

他們的「生產計劃」，整齊劃一。他們正忙於「建立農民運動」。同時為加強軍民合作，另有一種運動叫「幫助駐軍生產資本及生活用品，可分調劑，慰勞團借給糧籽一三三石，農具三〇四二件，窩洞一三八〇元，用具八〇六五件，牛車三二輛，（二）慰勞雞七八八〇隻，食品九五五七〇二斤，糧食五七九四八八五斤，幫牛丁二八八垧，牲口五頭，文具三套，鞋襪一八八八九七雙。這是擁軍聲中老百姓所唱的，不停的演，就是托兒所裏兩三歲的小孩子，唱着便是：「八路軍，保衛邊區……」

關於遊擊戰術，我們會向朱總司令請教過，他

攻戰，積極性的，主動的，同時是集中的而非分散的。無一定規律可循，這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和交通戰，武器戰只佔一小部份。故遊擊戰是很靈活的，可以說是老百姓的戰術。但是否能最後解決問題？那是要配合正規軍的。當時我們又問：慣於打遊擊的隊伍，須訓練若干時期，始適宜於作陣地戰呢？他答道：須經半年至一年之訓練，並加以改變裝備。

陝北之行

延安觀感

中央

中外記者團西北參觀團返渝後，該團團員中央日報
選，於八月五日舉行廣播演講，題為「延安觀感」。其
今天我所要講的是「延安觀感」。這次中外記者團
天，在陝北所謂「陝甘寧邊區」停留了四十三天，中有一
延安是一個古老的鄉村式的城市，城內曾被炸過一
遺留的只是一片荒涼，店舖分散在近郊，兩旁山坡上疏
所——壩洞。延水在城外急急忙忙的奔流，車馬會在急
東西的交通隔絕幾天。附近僅有的名勝便是清涼山的萬佛

看做了延安一個明顯的指標。

一到晚上，山半窩洞裏，閃爍着的燈光，有如義林古剎，倒有片刻清靜的夜景可以欣賞，只是叮叮打的打鐵聲，以及一二聲粗厲的號叫，會驚破這古城的寂寞。

延安現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神經中樞，中共中央，十八集團軍總部，西北政務局，「邊區政府」，留守兵團，「中央黨校」延安大學，解放日報，新華社以及日本俘虜所設立的工農學校等機關學校，都集中在那裏，部隊大都忙着墾荒，公教人員每天也有二三小時默默地坐下，嘩嘩嘩的搖着紡紗機子。

『延安缺乏社會生活』。這句話是延安文化人前軍在文化座談會上講的。解放日報的副刊上，却否認這點。裏面說：『延安的社會生活頗多樣，頂活躍，集體生產和學習，特別是色彩繽紛的各種各樣的晚會，都是大後方所沒有不能有的富有生氣的羣衆性的社會生活』。由此想起王實味的『野百合花』裏，也有『歌囀玉堂春，舞迴金蓮步』這一類的語句，但也因此而興起一場『文字之獄』，終於被戴上一頂『托派』的帽子，然則延安說

竟有沒有社會生活呢，這個問題要分開來說，如果說社會生活，就是指「歌嘯」「舞迴」一類肌肉的機械的波動，那末，延安是有社會生活的。如果說社會生活另有其實質，不盡在「歌嘯」「舞迴」之間，那末延安的社會生活是有問題的。

人是理智的，同時是感情的動物，有靈性，有真情，有自由的意志，如果人與人的接觸交往，只是接觸交往，而沒有靈性，真情實意的貫注和流露則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然而今日的延安，正向着這一個方向努力做去，「生氣」是談不上的。

中共的指導原理，是反人性論，反自由主義論，一切服從階級，服從無產階級，及其「代表」的政黨——共產黨。他們說：「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應該指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衆團體」。階級的「恨」，佔住了他們整個的身心。以此為出發，經常的展開所謂「兩條戰線的思想鬥爭」，使人所異於禽獸的靈性，真情，實意，銷磨斷喪於敵對鬥狠之中，由黨內而及於黨外，及於一般社會，那裏沒有生氣而充滿了殺氣。

記者腳踏進「邊區」，自涼水屋到延安途中，曾親身領略到幾幕「爲鬥爭而鬥爭的鬥爭」，他們戴上最大的帽子，發出最慘厲的語調，面孔板得兇兇，牙齒露得長長的，他們忘記了我們是新聞記者。到了延安，六月十四日聯合國日華衆大會上，更把他們的仇恨，發揮到極度，他們當衆扯了一個謊，說自武漢失守以來，整整五年半的時間，共產黨的部隊「抗擊了敵偽四分之三的兵力」，「敵人對正面戰場，只作過幾次職役性質的作戰，都毫無去晚歸，並無戰略的與佔領性質的進攻，國民黨統治人士在此期間的政策，是招架與觀戰的政策，敵來招架，敵去袖手」。同胞們，試問這五年半來的事實是不是這樣！

我們在延安，沒有採訪的自由，電信要受檢查，來信也被拆閱，我們的參戰，是在招待人員「保護」之下進行。有一位記者有一次中途拆開到店舖裏去買些東西，事後招待人員提出嚴重警告說：照這樣自由行動，如發生生命上的意外，我們不能負責。一位外國記者，向天主教的教友問起姓名年齡籍貫以及身世時，立被招待員派詞制止，說「你們沒有權發問」。所以如果說：我們在「邊區」四十多天，根本沒有訪問到一個真正的老百姓，

陝北之行

並非過甚其詞。

這或許是他們『黨性』的表現，
干部黨員，在談吐表情之間，也會
苦悶的，恐怕要算是青年學生和文化
人只得僥倖伏在紡紗機的前面，暗暗地
掠過時，會使他們感到連流淚也並不
路條』！這正所謂欲行不得，欲哭無

在文化座談會上，有位記者問她
她答道：『邊區社會，有無不合幻想
要不如如此，初期抗戰的一套，不能
農。現在整風運動中，首先要改變
習』。他們正在『改變』中，無『改

「整風」的另一面恐怕是封建性的偶像觀念的培養，部隊中的標舉着「爲毛主席的事業而奮鬥」的旗幟，一個托兒所的禮堂裏，毛先生的龐然肖像，獨佔在正牆的中心，兩邊以「國父遺像和孫夫人的肖像陪襯着。而「太陽出來一點紅，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種神話式的語句，早經見之於小學教科書裏，並以秧歌的方式，向民間傳播着，黨報在封鎖新聞，使「邊區」的人民，淡忘國事，即國家元首向全國軍民所發布的重要演說文告，他們也是無法讀到的，從人們的心靈上思想上，予以根本封鎖，要算最殘忍的一種封鎖了！

至所謂「三三制」的「民主」，在「邊區」參議會本身就沒有做到。只拉了若干外國人進去當了參議員，所謂言論，集會結社等等自由，在一黨專政之下，並沒有找到什麼影跡。

當我們在延安臨走前幾天，有幾位中央幹部黨員問起我的觀感如何？我不願敷衍他們，曾不客氣的指出三點：造謠不就等於宣傳，政治不就等於兒戲，人不一定能改造成爲機器！

回到西安，有人問起我此行感想，我也以兩句話來概括，增強了我們的自信心，同時

陝北

增加了我們的責任

親愛的同胞

記者在延安

掃蕩報記者謝爽秋

延安本是一個古老的城鎮，然而現在的延安城却只是一堆堆廢跡的瓦礫，自被毀於二十八年敵機的狂炸後，「延安城」已散處在四郊的山腰，祇有南門外，建立起一條小小的街道。

車子到達城郊七里鋪時，看見一排排的窑洞，車上的主人告訴我們那是中共的黨校，可惜我們始終沒有被帶領去參觀過。

到延安後，我們被安置在南門外的交際處，領隊人員和中國記者住在交際處山上房屋最高的一層，外國記者則住在南門口的底下一層。自從出發以來，中外記者第一次被分離，這提議大家現在是在延安。

三十二天之中，我們會見了中共黨政軍的一大堆要人，如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高崗、吳玉章、秦博古、葉劍英、賀龍、林彪、徐向前、蕭勁光、聶榮臻、李鼎銘、徐特立及譚政諸先生。

中間，在主人的周到安排下，我們參觀過延安的經濟、政治、司法、文化、教育及醫務各種機關與設施，聽了許多次談話，還觀賞過延安的秧歌、話劇、音樂、平劇以及魯迅文藝學院的遊園舞會。

六月十四日我們被約請參加號稱到了三萬羣衆的慶祝聯合國日與開關第二戰場的大會，會場氣味的辛辣，浸入了每個中國記者的意識之中。延安有兩家報紙，一是解放日報，一是羣衆報，據說兩報的發行數目都是七八千份。在延安的那些日子中，我們感謝解放日報的主人，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份，（據說由於紙張缺乏，報紙實行配給制，能單獨分配到一份的人很少），解放日報是中共的機關報，充分表現其「鬥爭」的作風，記者團諸同人都深深感到我們是在讀報也是在被注入許多東西。

到達延安的當日下午，我們中間一部份人遊覽了一下南門外市區的風光，首先吸引我們進去的是一所門面頗為漂亮的婦女合作社門市部，所賣的東西，據說全都是婦女生產的，除了一些布匹外，最多的是毛線毛衣和一些兒童玩具。

說起延安的知識婦女，其裝束實在很難和男性分別，大都同樣穿着一套灰布軍裝，戴軍帽，繫皮帶，腳上却是一雙草鞋，不僅服裝如此，連走路談笑的態度也很難找出與男性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延安男女人口的比例，頗為懸殊，據說是十八與一之比，由此可以知道光棍在那裡是相當多。在某次文化界的招待會上，作家蕭軍大談其缺乏「社會生活」的苦悶，我不知道是否與此也有點關係。

我們的到達，似乎全延安都早就知道了，街兩旁的人擠在門口看，迎面的行人也都停下來注視一番，這頗有點使我們有受寵若驚之感。

雖然逛了好幾家商店，可是我們都沒有買一件東西，原因是法幣在延安不能直接流

陝北

道，還要向當地銀
所謂邊幣。那時的

我們曾有過機

層洋樓的建築。但

拿一元法幣可以換

安後，大家使用鈔

個月零幾天的關人

我們常常走訪

過那里想進去，又

馬、恩、列、史、

掛在每個機關職

雄，去年延安舉行

的典型加以鼓勵，壞的則加以打擊，後者如推行「改造二流子運動」可爲其例。

新華書店陳列的書籍，充分表現了出版物的強烈黨性，我們很少看到與共產黨無關的書籍，黨性強烈這一點，在和我們接觸的任何人物的談話中，也無例外，說他們對於同一問題的說法，像背誦公式一樣，似乎亦不爲過，這頗使得我們自外面去的人，感到置身於壁壘之中。中國記者團諸同人，在那些日子中，大都是按照主人爲我們安排下的程序，同去，同歸，同吃，同住，很少有過個別的訪問與參觀。

在延安除了會見過前述的許多中共要人外，我們還曾見過一位日本共產黨員岡野進其人，岡野進在延安主持的事業是一所訓練俘虜的日本工農學校，工農學校現有學生七十餘人，據說前後曾有三百餘人，一部份已出外工作。岡野進的主要工作似乎是將學生組入「日本人民解放聯盟」最後組入「日本共產黨」他會特地爲中國記者舉行過一次談話會，他對於「日本天皇」制度及其力量的看法，和重慶的一體反戰日人的看法頗有出入，他說：「今天日本天皇在一般日人心中還保有深強的信仰，如果今天提出打倒天皇的口號，將會

陝北之行

加強他與少壯軍閥東條輩的團結，推倒「
有益」。東條內閣現已在危機重重下顛倒

在延安我們還看見過若干外國人士，
燕大教授英人林邁可，加拿大醫生馬海德
自北平轉入冀察晉，先我們一個月到延安
非女士，也是中國人，據說是從前上海的
該是中國太太的功勞。不過太太兩字在陝
我們還參觀過延安大學，聽過一次「
看到一個關於三十三年度在學青年的統計數
人。

小學和中學我們沒有去觀光過，延安大
學大我們都看到許多學生在紡線，據說每個

斤可以歸私人有。據延安校長周揚說：學校經費是百分之六十以上是由這種生產來維持的。我們知道陝北從前有所謂陝北公學（其後改爲青年幹部訓練班），魯迅文藝學院，和自然科學院，從今年五月起，已通統歸併在一起，另外還加上一個行政學院，名爲延安大學，對於上課不上課，學校似乎不大注重，注重的倒是小組討論，據說一切學習都要以邊區爲主要對象，學生來源也大部是從各級工作部門調來的幹部，畢業後全部分發工作，實際上也就等於一個幹部訓練所。

魯迅文藝學院雖然屬於延安，可是設在相距十里外的橋兒溝，我們去參觀的那天晚上特別舉行了一個相當盛大的舞蹈晚會，用梵阿林湊着流行陝北的秧歌調子，在罩着紅綠色紙的煤氣燈光下的泥場上「大跳其舞」。這種舞會每週禮拜六日晚上，各機關大都舉行。自從抗戰以來，我就沒有嘗過跳舞的滋味，自顧日久生疏，怕踹壞人家的腳，所以舞會雖大，那天晚上，我竟沒有敢嘗試。

延安有一張標明學生家庭成份的圖表，在家庭構成欄中，有「官僚」一項。頗爲別

陝北之行

級，值得一提。

另外一張對於邊區六年來中學畢業，針對重重在工作幹部的訓練，那圖表上寫之五九，行政工作的佔百分之十七，軍百分之十九」。

據那裏的教員負責人說：三十三年軍似乎沒有計入），中學六所，完全小以一百四十餘萬人口來計算，能說中小學採用的課本，是自己編訂的延安停留的那些日子中，的確參觀過不體行動，在採訪上講，記者個人所感觸下，沒有能夠深入。

「此間沒有社會生活」

蕭軍在文化界座談會上大聲疾呼

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趙炳煊

今日的延安城到有點像羅馬帝國「邦貝」的廢墟，破落不堪的城垣，依舊支撐在延水的側面，城裏也還有一條完整的大條馬路，但是除掉一家驛馬店，幾處兵站以外，我竟發覺現不出任何人家，也找不到一個屋子，滿眼所見，盡是一片瓦礫場，此外便是大批雜草，長得尺來高點綴其間，景象十分乾涼。

翻開歷史又一看，往日的延安，完全不是這一副面孔，舊城本是宋范仲淹所築，代它原是府治，漢回雜居，人口有八千多，算是陝北頂繁華的城市，抗戰發生以後，中武

在此建立大

以後的

樣，接連來

沒有被炸的

大磚石，他

家店舖依然

延水流

形，在山披

遠，老早就

在山腰中，

鑿洞建築省

之多，真也

鈕扣，破了袖口或領子，這是非常普通的事。女同志也是和男同志一樣穿着同樣的衣服。甚至有一位女翻譯員和我們一道混了這麼一個月，有一位記者在臨行時還不曉得她究竟是男性還是女性。

一位當地政府的高級官吏會和記者談到「邊區」衣着困難的情形，他說「邊區」原先根本是一塊「窮得可憐」的地方，糧食和棉花根本就不能自給自足，當「紅軍」初到此地的時候，大家在冬季甚至連棉褲都找不到一條，結果弟兄們害關節炎的所在皆是，後來他們努力生產提出「豐衣足食」的口號來，直到去年為止，他們的糧食總算已能勉強維持，但是棉花依然相差很多。在定邊，靖邊一帶地方，他們產鹽，鹽的附產品是鹼，因此他們要從千里以外徵購老百姓及其牲口，載着大批鹽和鹼，向山西陝西一帶去掉換棉花和布疋，同時他們還有藥材和皮毛向外推銷。但是他們的貿易並不能平衡。

他們也承認去年以來，他們從前方調動了大批軍隊回到「邊區」來，軍隊的供應問題和大量的「入超」使得「陝甘寧邊區銀行」不得不發行大量鈔票，在延安，五百元和一千

尤一張的貨幣幾乎滿天飛，物價的高漲也是令人咋舌，一盒火柴要買到百元以上，一百小米值洋好幾萬元，物價高漲的負擔，我們在戰時大都身受其痛，由此我們更可以想到「邊區」的人士一定爲它壓榨與喘不過氣來。

在延安全市，我們找不到一家戲院，一個娛樂場所，每天大家都是忙於工作和生產，在這種環境裏住久了，人們非感到生活的乾燥與生命的枯萎，怪不得在文化界座談會上，蕭軍大嫂向我們疾呼說：此間沒有社會生活，一天到晚一年到頭朋友們都是任極度緊張的環境裏工作，我有些害怕，有機會時我也想到大後方去溜達溜達。

「邊區」政府也曾極力想辦法促進精神上的生活，他們也設有平劇院，毛澤東並曾請該院同人表演平劇，歡迎記者團，他們也有秧歌隊和歌詠團，利用當地的民歌加以提高並增添濃厚的政治色彩，每一個機關每個星期六晚上還舉行跳舞會，男男女女大家都穿着草鞋，地在草地上跳，場上也將二胡鑼鼓和提琴奏出有節奏的音樂，可是這些娛樂機會畢竟還不夠滿足四萬市民的要求，尤其男女問題，在這兒最感到嚴重。延安男與女的比較，

真如王實味所云是「十八比一」。

精神食糧在延安也是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那怕這麼多文化人擁擠在這兒，無奈出版條件極度困難，延安市就只有「解放社」一家印刷所，裏面也有幾副中版機，但每天要印刷「解放日報」，每星期還要印刷一份羣衆報，這兒沒有一份期刊，華北書店新華書店雖也屹立在街頭，但是裏面所擺的書籍爲數甚少。

「解放日報」是中共的喉舌，也是「邊區」境內唯一的報紙，他完全反映中共對時局的態度，從記者團入延安之日開始，它就一直以極度猛烈的態度抨擊國民黨和中央政府，對於大後方的消息，它發表的數量幾乎減少到使人不能想像的程度。

記者團也曾參觀他們的學校，小學和延安大學都留有我們的足跡，據說他們小學是五年，中學三年，大學二年，抗日大學是軍校性質，早已遷到前方去了，我們深以未能領教爲憾。「邊區」政府教育廳長柳湜曾和我們談到他們教育的特徵，他說他們的教育注重實踐，外面的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只有滿肚的理論，一時沒有用場，他更具體的說「邊區」

中學是造就低級工作人員，大學是造就中級工作人員，延安大學，據校長周揚談其中一分設三院：行政學院，自然科學院，和魯迅藝術學院，自然科學院尚在籌備期中，魯藝設在城郊十里的橋兒溝，我們曾欣賞他們的木刻成績與音樂會，聽到一首民間情歌時我們大家都感到一陣淒清。

我們也參觀了他們的行政學院，他們沒有教室，大夥都住在窯洞裏彼此討論彼此研究，偶然也由「邊區」政府各廳廳長跑來講演行政的實際情形。

他們的宣傳和教育，都從馬克思主義的「恨」人出發，在一冊小學國語教科書上，我們偶爾發現了這樣一頁課文：「反動派，沒天良，不抗日，想投降，一心反對共產黨，想奪我的牛和羊，我們拿起刀和槍，保衛邊區和地方。」弦外之音不言可喻！

毛澤東會見記

時事新報特派記者趙炳煊

毛澤東，這位中國共產黨，央委員會兼中央政治局的主席，在陝北幾乎成了一個半神祕性的人物，大街上張貼着頌揚他公德的標語，公共場所高懸着他的巨幅像片，教科書裏充滿着他的傳記課文，還有窮鄉僻壤都流傳着謳歌他的秧歌。

在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留延安的一個月裏，他一連接見我們三次，第一次是公宴記者團，第二次是解答中國記者所提出的問題，第三次是慶祝美國國慶紀念，並饒別離延安諸記者。

延安南郊的童山，在延水對岸楊家嶺突然蜿蜒下降，凹成一道深入的山坳。這兒居然有一幢西式建築的大廳堂，門外還停了一輛流線型的小汽車。毛先生第一次就在這裏接見

我們。他穿着一套不甚合身的粗呢料中山服，領扣從不扣緊，雪白的襯衫領子露得很清楚。頭髮留得很長，亂蓬蓬的沒有修飾。他額角很高，右邊還顯露出一根很粗的靜脈。

他很健談，在第二次與我們會面的時候，他從下午四點鐘，一直談到晚間十點鐘，毫無倦容。講話不拘形式，在正式解答了我們的問題以後，便坐下來，圍着桌子大擺其龍門陣。他離開家鄉將達二十年，但依然是滿口湖南湘潭的土話，鼻音很重，雖然如此，可是他的口才和煽動力，並沒有受到妨礙。

今年他還不過五十一歲，面容很豐腴，個子也高大，有人說，幾年前他身體很衰弱，現在要健康的多了。但他的聽覺似乎不很靈敏，記者和他談話，他常常將耳朵接近我們的嘴邊來傾聽。他好抽紙烟，一邊談話，一邊抽個不停，每一口烟全部都吸取進去，吸烟的響聲很大，全沒有烟朵呼出來，看來抽烟的資格是夠老的。

早睡早起的習慣，在毛是沒有的，他每天起床很遲，工作多在下午和晚間，而且愈晚做事愈起勁，公餘之暇他好散步，好欣賞平劇和歌詠，每次招待我們表演餘興之時，他總

是陪同我們觀看，有時到深夜二時才散去。

在延安，我們會見了許多女界名流，像女作家丁玲，女明星陳波兒，都是。可是我們偏偏見不到藍頰（毛澤東的夫人）共產黨的朋友告訴記者，毛先生很歡喜跳舞，星期六晚上常借同藍頰出席跳舞會。在第三次招待記者團的預定節目上，原來排定有跳舞會，我們滿以為這一次一定可以一觀藍女士的豐采，可惜到時大雨傾盆，草地舞場不能使用，我們都伴伴返回旅寓。

陝北之行

所謂陝甘甯

中國共產黨成立至現在已有北來作目前的根據地，自有其歷史，但是大多數的讀者，都知曉

陝甘寧邊區在十五年前——

域發動游擊戰實行土地革命創立局書西兼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千里長征」浸入這個地區，「長

邊區現在轄地為陝甘寧三省

南臨渭水，地質屬黃土層，有深溝，有高原，也略有平原，宜農宜牧，氣候帶大陸性，冬嚴寒，夏酷熱，但各地不同，延安盛夏可穿夾衣，綏德，米脂及關中又非持扇不可。這些的邊區地盤，大部分是荒涼貧乏之區，生產極不豐盛，生活亦很艱苦。

據邊區政府的報告：邊區現有人口一百四十八萬，面積九萬九千方公里，為行政實施便利計，劃為一市三十縣，五個分區。延屬分區，轄：延安市、延安縣、甘泉縣、鄜縣、志丹縣、安塞縣、子長縣、延川縣、延長縣、固臨縣、人口約三十八萬，主要出產：小米、棉花、棗子、梨子、杏子、煤、鐵、煤油、石膏、牛鹽。

綏德分區，轄：清澗、綏德、米脂、葭縣、子洲、吳堡、神府等七個縣，人口五十六萬二千，主要出產：小米、小麥、高粱、黑豆、小鹽、棗子、大蘋果、蠶桑、土布、煤、大黑鹽。

關中分區，轄：淳耀、赤水、新正、新寧等四個縣，人口約十二萬一千，主要出產：小麥、蠶蜜、藥材、木耳、鐵、煤、木材。

隴東分區，轄：慶陽、合水、環縣、鎮原、西子、華池等六個縣，人口約二十六萬二千，主要出產：小麥、蜂蜜、煙葉、牛、羊皮毛。

三邊分區，轄：定邊、鹽池、靖邊、吳起等四個縣，人口約十五萬五千。主要出產：糜子、蕎麥、鹽、皮毛、甘草、蕨子、清油、牛、羊。

以上老百姓人口百四十九萬（加上部隊，機關、學校人員十萬，即為百五十八萬）。百四十八萬人口中，分配過土地的只佔半數，各個分區都有部分地區未分配土地。

邊區的編員已如上述。這次記者團進入邊區所經各地都稱為：「延屬分區」是三五九旅的防地，三五九旅旅長王震兼任延屬分區警備司令。

西行漫談

商務日報記者金東平

商務日報記者金東平於八月十九日應中央廣播電台之邀，發表廣播講演，題為「西行漫談」，原詞如次：

各位同志，各位同胞，本人代表商務日報參加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到西北各地去參觀了兩個多月，今天能夠有這樣一個機會來向諸位談一談西行的見聞，個人實在覺得非常高興。

這次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西北各地逗留得最久的地方，便是陝北的延安，所以，現在我所要向各位報告的「西行漫談」也就是祇限於在延安一個多月的見聞和觀感。

大家都知道。延安是共產黨的大本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主席毛澤東，就經常的駐在

延安，指揮着他的黨員和軍隊，統治着所謂「陝甘寧邊區」的一百四十幾萬的人民，所以，一提起延安兩字來，大家都不免有一種神秘的感覺，延安到底是地獄呢還是天堂？延安和重慶又有什麼區別？現在，我可以將我個人的遭遇和見聞，大概的向各位介紹一下。

陝北，本來就是三年一小旱五年一大旱的地瘠民貧的一個所在，民國十九年到二十四年的這一段期間，又經過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等所謂的「革命」和「游擊」所以就更鬧得十室九空，到處充滿一片荒涼景象了，一直到現在為止，這些斷壁殘垣的遺跡，還保留着不會洗去。

民國二十四年，毛澤東、朱德、由江西跑進延安，同劉高等打夥合作，陝北的局面，便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毛澤東到底比劉志丹等聰明一些，他們一到陝北，便鑒於當地的地廣人稀，祇要有勞力，就不愁沒有飯吃，所以當時的毛澤東就不得不收拾起他在江西時所實行的那一套共產主義的「土地政策」，而也打起三民主義的招牌來，以號召陝北的民衆了。

從民國十九年到現在，共產黨之在陝北，已經有了十五年的歷史，在這十五年中，共產黨的「政策」，是有着不斷的變化的。無論是從「沒收土地」變爲「二五減租」，或是由「要求三八制」變爲「努力生產運動」，而陝北的民衆們，却依舊的保持着原有樸實和真誠。

現在陝北的工人和農民，大概每天都有着十二小時以上的工作，他們所得的報酬，雖然僅僅是三餐小米，一套布衣，而他們工作的勤奮，却始終是絲毫不懈，也許，在他們的內心裏，正深含着無限的悲苦和酸辛，可是，在共產黨利用「抗日必需努力生產」的號召下，我們却從來不曾聽到他們吐露過半句怨言。這種人民，真不愧是黃帝的胄子賢孫，真不愧是一華民族的優秀兒女，今天，個人在重慶遙想到陝北的同胞，真是不勝其懷念與關切。

談到陝北的民衆生活，在我們的眼光裏看起來，真是不知道已經低到什麼程度，他們所吃的小米。較之我們的平價米不知要壞多少倍。他們以一年或兩年的過分的辛勞所換到的一件布衣比起我們的買平價布來，更不知道要困難多少倍，但是共產黨要他們說「現在已經是豐衣足食了」，他們於是就毫不抗拒的一致點着頭說：「我們已經是『豐衣足食』」

了。

所以，當周恩來問到本人對於延安的觀感時，我就老實實的和他說，「陝北民衆的勤奮，確實是遠較重慶爲佳。而自由活潑的程度，却遠不如重慶」。

當時，我同周恩來說：「周先生是到過重慶的，重慶民衆對於政府的批評。周先生也應該聽到過，可是我們到了陝北以後，却從來沒有聽見過有人批評政治好壞，中共的一切措施，人民當真的就沒有一點不滿嗎？就是記者團和毛澤東先生談天時，他也不會斷然的承認。那麼，人民爲什麼不講呢？不用說，當然是由於「不敢」，中共是一天到晚在喊「民主」的，我想不到在中共「治下」的人民，竟然是這樣的沉默。我雖然不敢說這是中共的不「民主」所使然，而民衆自由活潑空氣的養成，中共似乎是仍要加點努力」。周恩來對於我的這個「建議」，竟然也表示了接受。

講到這裏，我想起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送給我們的大地圖來，在這張地圖上，全國的各省裏，大概都有用紅筆圈着的「中共軍事根據地」，祇有江西一省的區域裏，却保

留着一片潔白，江西爲什麼沒有共產黨呢？有人說，這是同患傷寒病一樣的道理。大家都知道，一個人害了一次傷寒病，給醫好了以後，便一生也不會再發，這是爲了傷寒病菌有着免疫性的關係，傷寒病菌一侵入人體，除非是它永不離開，一直到那人病死，要是它一旦被醫藥驅走，他本身所遺留下的毒素，便會制止它第二次再來，拿這種說法來看共產黨過去的「政策」，確實是已經適用於江西，至於將來是否也適用於陝北，現在，我們都還不能下一個肯定的斷語。

陝北的一般人民的生活，既是如此，一般公教人員和部隊裏的士兵呢？大致的情形也是這樣的。

前幾天，本人所代表的商務日報的社論中，曾談到毛澤東著的「財政問題與經濟問題」，我們曾提出共產黨現行的，財政經濟政策是開源而不是節流因爲他們要「開源」，所以不得不加緊的「生產」，所以，陝北的公教人員和部隊裏的士兵，也全都要求參加「生產」工作。

陝北的公務員，是除了管吃小米以外，沒有計給薪給的，據說是每人每年可以得到一兩套衣服。如果是除此之外還要想買點別的東西或是抽抽紙烟，那就非得另外「生產」不可了。所以，陝北的公務員除去辦公之外，還要種地紡紗，並且，這種「生產」的收穫，并不完全屬於自己，其中還要提出一部份來繳給服務機關，因此，陝北的公務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沒有家眷的，有的雖然也結了婚，而夫妻們却仍舊是各過各的生活，很難組織所謂新「家庭」。

軍人的生活就更不用說了，我們所看到的三五九旅，現在全部的精力和時間，都放在「生產運動」上，所以「開荒」的成績也就特別的好，他們除了自己的衣食住可以全部自給以外，還可以繳給「公家」很多的「公糧」。因此，全旅士兵的手上，大多數全磨成了血泡。在洛川，我們曾經遇到九個不堪忍受這種過分的勞力的榨壓而逃出來的士兵。

三五九旅是中共的精銳部隊之一，在陝北從事「開荒」，已經有了四年多的歷史，所以他們有着一塊良好的墾區，叫做「陝北的江南」的南泥灣。這塊墾區的主人，便是旅長

王震，他們又有着不少的「軍營商店」叫做「團結部軍人合作社」，王震便是合作社的大老闆。

提起王震來，這個人是非常的有趣的：

有一次，記者團在延長縣的一家門上，發現了裏面有一幅內有「打倒國民黨」字句的春聯，有一位外籍同業史坦因先生，對此事向王震提出了質問，王震不相信有這麼一回事，堅持着要街上去找，結果竟然給我們找到了，果有其事，從街上回到我們的住宿地後，王震惱羞成怒的罵記者團全是「特務」，本人便和史坦因先生向王震提出了抗議，請他將所說的話收回，却不知抗議的結果，竟然使他遷怒到中央日報的代表張文伯先生身上去，張先生剛剛站起來還沒有講到幾句話，王震便命令着他道，「我不准你說，你是中央日報的，要說，咱們單獨的到外面去談判」。他對於記者團這種強硬的仇視態度，隨我們怎樣辭釋，他却始終不變的保持着，一直保持到和我們分手，似乎還餘怒未息，如果用毛澤東的話來批評他，他真可以說是「一個「頑固份子」，毛澤東解釋，甚麼叫做「頑固份子」

陝北之行

子」時說：「固者、硬也、
用來，真是再恰當不過了，
的，他今天頑固，明天頑固。」

最後，說到陝北的教員和
「延安」，是屬於所謂「陝北
守兵團」的，我們去的時候，
十架紡車，男女學生都在努力

我們對於參觀陝北學校的
復唧唧，教授當戶織，不聞

陝北的一般生活情形，既
說他們的一般的心情，都同生

因為延安祇有一家中共織

是從來不大刊載的，所以陝北的同胞們對於我們前方和後方的情況，都異常的隔膜和關切。

所謂「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蕭軍先生和女作家陳學昭女士，都曾表示過願意到重慶來看看的願望，蕭軍並對記者團說出了他在延安的兩怕，一怕沒有社會生活，二怕寫了東西無處出版，這兩句話，是很可以化表一般人的，可惜當「蕭參議員」這幾句話說了不幾天以後，解放日報的副刊上，便有人對這話提出了所謂的「批評」，此後我們沒有見過蕭先生，所以不知道他是否要「坦白」一下來承認自己的「錯誤」。

因為時間的關係，我向各位的報告，祇好就此止住，談的拉雜而無條理，個人非常時覺得抱歉，如果諸位要想同一問「延安到底是地獄呢還是天堂」？我想在我這一段簡單的報告裏，各位一定可以用自己的看法來找一個答案。

延延散記

新民報趙超構

民衆大會

六月十四日我們延安居留中最不是平常的日子，因為那天是聯合國國旗日，延安舉行民衆慶祝大會，我們借此也參觀了他們的羣衆運動的場面，會場在北門外的文化溝，兩邊斜坡，是天然的看法，中間平坦。分設主席台和指揮台，主席台前而聯合國國旗以八字形向前依次豎立，另外有一幅巨大的中原戰事形勢圖，平舖在主席台之下。

那天到會的人數，據宣佈有四萬人，在開會前，先進行各種半娛樂半宣傳的活動，我們到場時，一種「活報」名「開闢第二戰場」的正在上演。這是一種化裝的宣傳，市場的

有希特勒與東條等，劇情是無須敘述的，總之，是採取時事，加以渲染，表現希特勒東條的狼狽。其性質正如「活報」兩字，是準備給不識字的羣衆以時事知識。

活報之外，還有秧歌劇「一朵紅花」，由魯藝演出。此外有些民衆秧歌隊，和打四川連響的，也各據一方，吸引一部份觀衆。

會場的情形確是熱鬧，鑼鼓和人聲湊在一起，使得沒有興趣參加集會的人，也不禁裝擠去看一看。事實上，造成這種熱鬧的氣氛，正是吸引羣衆的一個巧妙的方法。

然而最使我們外來人感覺興趣的，還不是這些零碎熱鬧的插曲，而是一隊一隊的自衛軍。他們一律白衣黑褲，頭包白巾，身佩馬刀，手執紅纓槍，這一切，使我們看來，好像是個傳奇中的人物。他們是邊區武力中最低層的一種，平時不脫離生產，戰時也只是參加後方勤務，維持地方治安，我不能在這裏多敘那天開台的情形，因為宣佈開會以後，意外來了一個大題目，吸引了我們全部的注意力，使我們忘記了留心大會別方面的情形了。起初，我們以為是一個通常的慶祝會，臨時我們才知道大會的主題，並不在慶祝，而在「保

陝北之行

衛西安，保衛西北」的口號。這個口號，配合着中原衆確有刺戟的作用，當場沒有一個人知道正當開會的們知道，也無法教大會的羣衆安靜下來。因為有時在號，聲震山谷，就是指揮台上的總指揮，也難於制止不要喊了，同志們！」。無如這一隊的呼聲停止，那的演說總要打斷好幾次。要不是最後天上洒下雨點，總指揮的喉嚨都要喊破了。

生活標準

延安一般機關人員的生活，並不靠薪資而靠供給供給制度有一個公家規定的標準。這標準依着物，一個人的基本生活，如衣食住日常用品，以及醫

障。

但是這種生活品的供給，並不是全部由邊區政府發給的。有的機關，幾乎全靠本機關人員生產者自給，有的機關，自給一部份，另由邊區政府供給一部份。完全自給的如三五九旅，除了不要政府負擔外，每年還節繳幾萬擔公糧給政府；不完全自給的，如中共直隸的機關，自給百分之四十，政府供給百分之六十。自給的程度，各機關也不一致。大體上，各機關總儘量生產，不足之數由政府負責。

除了基本生活以外的消費就須靠自己生產。所以，每一工作人員的生產，可以分爲兩部份：一部份爲本機關生產，一部份靠自己生產。因此我們可說，延安各機關學校部隊工作人員的生活，大體上是標準化的，即有差異，距離也不會過遠。至於發生差異的情形，只有下面三種：

第一，是供給標準上規定的差異，譬如食米。機關幹部每人每天一斤三兩，部隊每人就有一斤八兩。高級幹部每人每月吃肉四斤，普通幹部每月每人吃肉二斤。技術人員每月

另有五千元邊幣的津貼，普通人員就沒有。

第二，要看本機關的生制情形。生產努力的機關，除了按標準供給生活品之外，還有多餘，這一部份多餘的生產，就可以用在本機關人員的福利上去，或者每月多吃幾斤肉，或者每人多分到若干日用品。

第三，還要看你個人生產的情形。個人生產除一部份歸公外，另一部份是自己可以支配的，當然生產得越多，生活也可以較好些。

所以，綜合起來講，邊區政府所規定的供給標準，事實上祇是一個標準。公家並不像證標準以上的生活。但如果機關的生產努力或個人的生產豐足，則超過這個標準的生活也是容許的。

思想標準化

除了生活標準化，延安人的思想也是標準化的。

我在延安就有這麼一回確定的經驗，以同一的問題，問過二三十個人，從知識份子到工人，他們的答語，幾乎是一致的。

不管你所問的，是關於希特勒和東條，還是生活問題，政治問題，他們所答覆的內容，總是「差不多」。

在有些問題上，他們的思想，不僅標準化，而且定型了。說主義，一定是新民主主義第一，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們對於國內外人物的評判，也幾乎一模一樣，有如化學公式那麼準確。

也不僅限於公衆問題，就是他們的私生活態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觀念，甚至如戀愛問題，也似乎有一種開會議決過的戀愛觀，作為青年男女的指導標準。

在延安，我有好幾次向他們表示，這種千篇一律的答案，刻板一樣的思想，是不是黨和政府有意造成的？

但是，他們一致堅決否認黨和政府對他們的思想有直接的管制。他們承認大家的思想

的確是差不多，至於差不多的理由，則基於大家對事實的認識一致，大家對黨策的理解一致。

據我的觀察，他們這種解釋有一部份是對的，但並不全是，我以為延安人的思想標準化，應該從下面三方面去理解：

第一，我們應該承認他們的生活是差不多標準化了的，因為生活標準化，對於生活的希望，需要趣味，感情等等也逐漸趨於統一。這是由於生活決定了意識，是自然而然的結果。

第二，我們應該認識他們的小組批評，對於他們的意識觀念有絕大的影響力。所謂「對事實的認識一致，對黨策的理解一致」，就是通過小組討論來實現的。

最後，由於邊區和大後方的隔離，思想文化的交換陷於中斷，就延安看來，簡直是在閉關狀態之中，許多延安人都向我們申訴過書籍雜誌進口之困難，這使得他們的認識不得不出於邊區以內所能供給的資料之中。

這種標準化的精神生活，依我們想像，是乏味的。但在另一面，也給予他們的工作人員以精神上之安定，而發生了意志集中行動統一的力量。

難得閒情

太緊張的工作，太短促的時間，無疑的對延安人的精神生活發生顯著的影響。這影響，可以說是好的也可以說是壞的。就好的方面說，延安市上很少有「開店終日，言不及義」的惰民；從壞處說，則是剝奪了精神的餘裕和生活的趣味。雖然每星期一日的休息權還是被保留的，而每星期六的晚會也多少可以解除一下疲勞，但有什麼東西都帶着新民主主義氣息的情形之下這種娛樂也無時不給人以緊張之感。它給你的感受，與其說是安慰，不如說是刺戟。

多數工作人員，對於他們的工作都很自信自負，這是唯一的安慰。除此以外，我不能發現他們還有什麼悠游的心境。一般地說，都因為工作過度而失却了輕鬆的情緒。在我的

記憶中，在邊區時從無機會使我們解放滿來大笑一場。我們看到的延安人大都是正正經經的臉孔，鄭重的表情，要人之中，除了毛澤東先生時有幽默的語調，周恩來先生頗善談天之外，其餘的人就很少能說一兩個笑話來調換空氣的。至於閒暇時間的享受，烟和茶，始終難於令人滿足。酒却很多，有荔枝酒，有梨酒，有高粱酒。說起酒，我記起了一位酒徒，簡直可以算是「延安的人瑞」了。那是在我們參觀一個酒廠時，在那個蒸溜燒酒的地方，遇見的一個老工人。他坐着看管，手裏就拿着一小瓶的酒，插一支竹管，不斷吸吸，兩頰通紅，醉態陶然，一面只是笑，不斷地自讚「好燒酒，好燒酒」！據管事的告訴我們，這位老頭子是整天喝酒，每天在醉鄉中的，外面什麼事他都不曉得，據我的感覺，全延安恐怕只有這個酒徒是還能有他自己的悠閒的享樂的人——大有你們忙你們的，我還是喝我的酒的意思。此後我就沒有看到比他更會笑的人了。所以，我說他是「延安的人瑞」。

我們很知道，延安是一個緊張工作的社會，一時忙於衣食，還沒有工夫理會細膩悠閒的享受。所以我寫了這一節，其意不在批評，而在報導延安生活的一方面的事實，自然人

總是人，在長期的緊張的生活中，總免不了感到枯燥單調。就這點說，我不能不覺得這樣的延安生活是不能滿足的了。

從十八集團軍談起說到中共土地政策

閻長官對中外記者團談話

盟利社興集特派記者通訊

中外記者團於五月二十六日下午抵此，盤桓五天，這是抗戰以來興集的空前的盛事，不，簡直是這山地有史以來的創舉。

中外記者對山西的新政，兵農合一制度和新經濟制度，感到無限興奮和欽佩，有幾位曾對記者說，不到山西，如何能對這奇蹟有深刻的認識與了解，他們尤其對官軍民的衣食住行的生活完全同一，以及抗戰情緒的熱烈，最感欣慰。

在這五天之中，閻長官曾招待中外記者團一次晚宴和兩度圍座會。對於山西黨政軍的

新政，均有詳細闡述。除了山西的新經濟制度及兵農合一外，最使中外記者感到興趣，發問最多的，要算有關十八集團軍的問題了。

關於第十八集團軍

記者問到今後如何使十八集團軍發揮抗戰效力時，閻長官認為只有十八集團軍實行二十六年九月廿二日中共之四項宣言：一，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二，取消蔣勤政政策與赤化運動，三，取消蘇維埃政府期全國政權統一，四，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率。並謂我（閻氏自稱）指揮十八集團軍七年以來，以我的經驗，欲使十八集團軍履行他的宣言，只有兩途：一個是希望他自動，一個需要他被迫。閻氏並對「被動」，作了一個詳明的解釋。他說：『所謂被動，不是指武力壓制，壓制他也無用；也不是向他請求，請求他也無益。是我們自責自勉，來規範了我們的民衆，接受了我們的領導，完成我們的政權，作我們被動的因奔』。

接着某外籍記者問到十八集團軍與中央軍地方軍有什麼理由引起衝突。閻長官用很溫和的語調說：「十八集團軍與中央軍地方軍每次衝突，都無正當理由。不過他要尋釁，當然可以隨時找一個不成理由的理由，比如現在我奉軍事委員會命令，派隊進駐上黨，經過汾東即遭共產黨部隊的阻止，發生衝突，過去迄今三個多月，曾衝突過八十六次。我有一點還得向大家解釋，中國共產黨與外國的共產黨不同，他不單是一個主義的集團，他是有地盤，有武力的，他的目的，是奪取政權，尤其是利用敵勢，拿上武力來奪取政權。可以說他甯願在我們身上放十槍，不願意對敵人打一槍，因為敵人不是妨害他奪取政權，是幫助他造奪取政權的機會，所以他認為對敵人打一槍也是白損失，對我們打一槍，有一槍收獲」。閻氏並講了一段故事：「民國二十九年華僑陳嘉庚先生，他經過延安來此，對我（閻氏自稱）說，延安對閻先生的感情很好，希望閻先生對共產黨作一個忠告，停止他們對中央的攻擊一致抗戰。我當時答覆他說，我不能說此話，因為共產黨是國際的黨，奪取政權是他實現主張的手段，我要勸共產黨停止他的奪取政權，就等於勸他不要革命

了，我如果勸共產黨停止了牠的革命，等於我今天勸陳先生你不要經營你的橡皮事業，是一樣的錯誤」。

衝突爲何不見發表

關氏說完了這段故事後，某記者以懷疑的口吻，請既然十八集團軍在抗戰開始，時有攻擊國軍的事實，爲什麼沒有發表？

關氏微笑答稱：「不只你不知道，就是汾東最近大小八十六次戰役中，我報告軍委會的也不過三五次，就我也不是經一次戰役，一次戰役的詳情全知道。這八十六次戰役中，×××軍電報詳報的也不過十次，其餘均係每旬的戰鬥彙報中報來的。我這裏有什麼事一向是向中央報告，但爲維持我們的團結，不願宣傳。政府對我也有過指示，能包容的就包容，不能包容的也不要向外宣佈，敵人說我們不一致，所以我除能包容者外，只有報告政府」。至此關氏再引述一件往事，他說：「三十年夏，××部×部長，奉 蔣委員長之

命，來此與我洽商要公，路經洛宜公路上麒麟縣屬的交道鎮，該地有十八集團軍駐守，曾被留難檢查二小時之久，×部長來了，和我說：「我幾乎被十八集團軍扣住，來不了。」我當時笑的說，「你是××部長，你不會給他下命令嗎？」後來據當時他同行的人說，返回時又經該地，竟被留難檢查達五小時之久。又聽說中途經過該軍駐區不應停車的哨所該軍哨兵竟向車發射一槍，×部長停車開槍原故，答曰：「我不打此槍，你就不停車。」後來爲了避免與十八集團軍發生衝突，不得已我始電請中央核准修築了一條韓宜公路。」

接着記者團提出的問題，轉到中共的土地政策上去了。

談談中共土地政策

閻長官就以中共的土地政策和山西的作了一個比較，他是從六方面來說的：（一）中共在陝北的土地分配，基本上是採取暴力沒收的，引起地主與富農的不滿，而在所謂「抗日根據地」，則實行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雖和緩了農民各階層的衝突但又未釐解決土地問

題。而我們山西劃分份地是以政治力量，保障了農民有永久土地使用權，和平的解決了土地問題。(二)中共分地，取消了地主的所有權。我們劃分份地，保障了地主的所有權(可收得一部份額定的收入)消除了地主對分地的反抗。(三)中共的分地，與國防無關聯。我們的劃分份地，是以兵農合一為基礎的，可以同時解決國防。(四)中共的分地依舊可以租典土地仍可以部份集中。我們的劃分份地，土地不能典租。無任何集中的危險。(五)中共分地以佃農為單位。我們的劃分份地，以組為單位，不僅打破個人零碎經營的方式，走上了集體生產的方式，而且解決了若干生產實際上的困難。(六)中共土地政策的實行，阻礙大，徹底難，因對象是個報復之私，目的是完成階級鬥爭，其方法是有取與的，且是先取而後與，故反動力大。我們的劃分份地，實行上阻礙小，徹底易，因對是論是個勞草合一之公，目的是完成抗戰建國，其方法〇〇而不取的，故反動力小。根本上共產主義對勞動者是『先甜後辣』，與人土地，收人的食糧，再行分配，無論如何巧妙的說法，根本的政治心理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們是按勞分配，對勞動者是盡甜無辣，與人土

地，不收人的食糧，使人負擔，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繼續有一外籍記者問及是否准許共產黨員活動？閻氏謂只要不破壞山西的政治，是可以允許，但共產黨組織的活動，是絕對不許的。「我們並且規定，如發覺共產黨員有破壞政治行爲，就送進真理辨正學院，與他們討論辨正，討論三個月後，再問他，如他仍信仰共產主義，就送他回延安，如信仰我們的物勞主張，就由我們分配他工作。現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分配工作的」。

因爲中外記者團均希望明瞭十八集團軍的活動情形，乃由郭參謀長提出了一個詳細報告。

中共抗敵規避主義

郭參謀長先申述十八集團軍抗敵情形，他說：『我在去年一年中，聽到敵方廣播，對十八集團軍有八次掃蕩，但未聞有激烈戰事，且十八集團軍皆於避戰，自去年年底至今既未聞

敵掃蕩，亦未聞十八集團軍襲擊敵人情事。至十八集團軍戰鬥力益，據估計正式隊伍不過×萬上下，其戰鬥情形，因該軍與敵軍作戰，素抱規避主義，有時躲避不及，應戰亦僅用小部隊應付敵人，很短時間即結束。近數年來，除正太路號稱百團大戰之一戰外，並未聞有其他大規模之對敵作戰。談到平型關戰役，係於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開始，共歷九日，晉綏軍主力四個師三個獨立旅共步兵二十一個團，砲兵四個團，九月二十五日，全線反攻，攻奪九個據點，晉綏軍擔任八個，十八集團軍擔任一個，係在平型關外之小寨村，在敵後方，攻取之後，我們希望他固守，他說不能，又要求他守三小時，我們派隊馳往接替，亦未等待，當即脫離戰鬥，晉綏軍又苦戰數日，總計晉綏軍在平型關血戰九日，犧牲十一個團，十八集團軍僅二十五日晨一次襲擊，並未聞有何損失。在法令上及軍事上說，十八集團軍係受第二戰區指揮，但自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平型關作戰起，該部即不按命令實行，後來在忻口作戰，本軍與敵相持的時候，前敵總司令衛立煌，因十八集團軍在敵後方，想叫他攻敵後路，此令下了，堅不聽從，以後司令部也就再未對該部下作戰命

令」。

襲擊友軍實例數則

繼由郭參謀長路舉十八集團軍攻擊友軍的實例數則：

(一)二十六年十一月太原會戰後，由太原撤出之友軍，多被強迫收編，不聽者殺害，賀龍曾表示，在太原戰後，增加一萬槍枝。

(二)二十八年十月二十四日，渾源靈邱之敵，分路向我靈邱南山之第十專署及保安司令部所屬進犯，第十八集團軍於該日夜間即乘機以步兵數千，將我下關第十專署及保安司令部包圍，當時我署部附近，僅三連兵力，奮勇自衛，巷戰至翌晨，傷亡幹部以下一百餘人，白專員志沂，鍾副司令有德，以所部正向敵作戰，乃率小部突出重圍，同時我駐中莊之幹訓團，北灣之劇團二百餘人及非戰鬥人員，亦於是夜被十八集團軍包圍，用機槍掃射，傷亡極重，我公務人員及政工人員，凡被俘者，悉遭慘殺，即民衆團體工作人員，亦

多被殺害。

(三)二十八年十一月，中央命令各戰區實施冬季攻勢，本戰區正在按照預定計劃實施之際，決死隊一部受命後，乃乘部隊移動之際，由韓鈞首倡叛變，由第十八集團軍掩護，乘機向我正在中陽離石及蒲縣汾西一帶與敵對戰之第十九軍第六十一軍後方襲擊，經我剿擊，乃竄晉西北，復向隴縣興縣一帶之第三十三軍及軍駐地襲擊，十八集團軍公然協助叛逃，不但冬季攻勢未能實施，晉西北之山西第二行署晉東南之第三行署，晉東北之第一行署，以下各行政機構，均被其摧毀，叛變部隊為五十四個團，殺害我軍官及地方官員三百四十五人。

(四)二十九年八月，我第四十三軍參加中條山戰役後，轉至沁水陽城地區整補之際，第十八集團軍三八五旅陳廣部，乘機向我第七十師駐地襲擊，並猛撲第四十三軍軍部，受傷害官兵五百餘名。

(五)三十一年三月，敵調集大軍圍攻晉西之際，但汾東浮山一帶之六十一軍力量較

孤，十八集團軍三八五，三八六，新五，新十各旅及軍七隊，由冀南豫北共集兩萬餘，圍攻六十一軍浮山賈家坡李家堡駐地，團長李丙申以下被害四百餘名。

(六)本年二月，六十一軍受軍委會命令向上黨進攻，甫抵汾東浮山，即被阻止，自二月至五月十八日三個月間，十八集團軍阻止六十一軍東進和我駐地襲擊，大小戰事已達八十六次，尤以二月十八日浮山合鹿戰役及五月十七八兩日王村戰役為最甚。合鹿戰役經過是二月十八日我六十九師二〇五團進駐合鹿當日午後，受十八集團軍三八六旅二千五百餘人襲擊，該團在駐營狀態中，猝不及防，陣亡營長丁連科以下二百六十四人，團長辛遠來負傷後羞愧自殺。王村戰役經過，係王村據點，由敵盤據數年，該軍未攻，自四月三十日我襲取後，該軍即於本月（五月）十七日以四千餘人向我圍攻，激戰一晝夜，致我王村守兵韓營長進忠以下一百四十餘人完全殉職。其附近霍寨堡，亦有我守兵六百餘人被圍兩日，二十四日雖被擊退，尚有滋擾形勢，致使我出擊命令，無法實行，且損失官兵甚多，甚為痛心。

x
x
x

中外記者團以團長官與郭參謀長之報告，都有事實根據，以最善意態度，詳盡說明西
北軍政實況，均感到此行之不虛，同時更盼十八集團軍能對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有深切
的領悟，協力大反攻，早日完成抗戰大業。

（六月一日貞毅寄自真集）

陝北歸客談「邊區」

這是十幾位文化戰士的報道

公正翔實地暴露出邊區內幕

——盟利通訊社特輯

漫遊陝北的記者歸來了。本社曾於一個下午，在編輯部草坪上，開了一個座談會，雖然記者們都在喊炎暑逼人，但是四圍的綠樹，半鈞的新月，和唧唧虫聲應和，大家心情上不覺恬然了。在座的有記者，有文化人，有教員，有學生，下面是座談會的記載，連同本社最近幾天向各方面採訪所得，用類別的方式寫出來。

克難坡瞻仰老將 記者先生們此行最感快慰，是克難坡瞻仰我們的宿將醴百川先生，

地方真小，環境真艱困，辦得真有精神，閻先生的心血，沒有白費，西行途中，這對比是沙洲中的綠樹。

閻先生在克難坡行的辦法，延安方面，雖然沒有批評，不過這是一種「效率」加「適應性」的比賽，真正有羣衆的政策，沒有人可以反對掉，所以記者們在延安，到處聽到是對於這個老先生的欽佩。

延長之行 記者們這次最不能遺忘的是延長之行。在延長陪伴記者們的是王旅長，招待記者們的是某縣長，這可以說是記者們初入陝北的第一個正式招待會，某縣長一上台就概括地把國民黨的統治，痛快淋漓罵了一頓，記者們多是年輕人，他們雖然並非每一個都是國民黨黨員，却感覺這是不公正，因為這位縣長自稱是農民，而且出於民選，就有一位商業報紙的記者，對「農民」與「民選」兩點上，提出幾個問題，尖銳的問話，把這位縣長漲紅了臉，王旅長便出來說話，態度不大客氣。

史坦因節外生枝 在這一愉快空氣中，外籍記者史坦因忽然問：外面為何還有「打倒

國民黨「『國民黨害人』」的標語。王旅長追問消息來源，史坦因不肯公佈，王就邀大家去看，天黑，路窄，主客都懷着不平靜的感情到了街角，許多人還在撕標語，地下還有標語的殘渣。王旅長便把大家又邀回去，解釋這標語還是歷史上的遺物，現在不能成爲國共間的障礙，不過他們以爲這次記者團中有特務，負挑撥兩黨感情使命而來。史坦因爲這不愉快的一幕，是由他一問而來，當場起立，請發言人把「特務」這個名詞收回。

一個被盤問的人 在這以後，又有一次招待會，一位記者發了言，却被盤問了二十分鐘，中國記者人多，發言是輪流的，這次被輪到的記者，事先無準備，只以國共合作等應酬話敷衍，講完了就被請到密室去盤問：「你是特務，你是特務」，理由是：「爲什麼不宜揚中共抗日決心，和抗戰的實績」？

這便是初入邊區的一幕！

征鞍回憶 因爲道路崎嶇，記者們乘車換馬，高大的戰馬，路呢，有時是高入雲霄的山徑，側邊響着澎湃的河流，有時是密林中的馬道，記者們是公子哥兒，征鞍上的表演，一

淚是小心翼翼，如墮深淵，一派是揚鞭急馳，神采飛揚，朱德，毛澤東部下的戰馬，一家跑死了一匹，豪情勝概可想。

國民公報記者周本滿先生，曾跌落馬下，大駭馬兩足一蹶，恰恰從額邊擦過，倖免重傷，新民報趙超構先生的馬，想在一叢高僅及腰的密林中衝過去，趙先生發蹄得快，兩手抓着了樹，在空中打了幾個秋千，才落下地。

參觀紅軍軍容 記者們參觀過紅軍軍容，是王震旅長的部下，槍砲裝配相當充足，但是不劃一，以臨時從許多地方集合攏來的。

不過他們山地戰的表現，却十分優良，一分鐘以內，拿着裝上刺刀的步槍，可以衝越五個障礙，刺上七個目標，許多人都能辦到，共軍適應環境的精神，是卓越的。

但在邊區的士兵相當苦悶，而且並不是完全物質上的苦，所以逃亡很多，記者團路上就遇見七個逃亡的戰士，還從他們身上得到三塊二五九旅的肩章。

黨性的強 記者們印象中的中共，是黨性的強烈，一切為組織（黨）而生存，一位記

者說：「黨性加強，是人性泯滅，不過這也許是他們生存的條件」。在邊疆，組織是真有效，為組織服務，夫與妻之間有秘密，父與子之間有秘密，在在是靜默。

你不慣於這生活嗎？離開是不可能的，十步一哨，五步一崗，任何人單。不過也非全無辦法，請求一個到邊境出差的公事，到邊境後黑夜昧這種人也不少。

中共的自我批判 因為黨的有力，毛澤東因整風運動而談達成的一元有效，今天的毛澤東，在邊區確有權力，表面已經做到令出必行的地步。

與一元化相並而行的，是黨的自我批判，最上層的意見，能迅速達到，上層對下層的容納性和適應性也強，一有事件發生，立刻檢討，有了糾正，記者團這次進延安，陪伴人員中，英語人材比延安準備的，為開得討改進，我們很佩服這精神。

在延安爲什麼不發電報 這次去延安的，外國記者電報發回不少，中國記者一個字不見，許多人關心這事，據各位先生的解答如下：（一）初到延安，一天到晚，被他們引去看統計表，說明書，頭惱漲痛，有些自己不相信自己的判斷，爲忠於所業，未觀測正確的，不敢寫。（二）在延安發出電報，說共黨任何缺點無法發出。本社記者當詢問：「中國人對延安的理解力，一定比外國人強，各位都自信觀察未清，不敢下筆，何以外國記者的電報既多，而又下肯定的斷語？」大家都不能答復我們這問題。有一位先生還說：在離延安的時候，福爾曼還親口告訴他：「邊區一切，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至今還是摸不着頭腦」。然而電報他却發得最多呵！

採訪與檢查 七月二十九日中央日報「陝北之行」中，對這兩個問題，有如下所述：「自由採訪、在『邊區』是不許可的，有次一位中國記者於參觀被服廠時，中途折回，到附近商店去買些東西，事移給他們負責招待的人員知道了，會提出嚴重的警告，照這樣自由行動，如發生生命上的意外，我們不能負責，另外一位外國記者，是天主教的神父，對

他的教友間起姓名籍貫以及身世時，一位陪同參觀的人員，立以英語嚴詞制止說，你沒有權發問，因此如果說我們在陝北四十餘天，並沒有得到宣傳性以外的任何意見的陳述，並不算過火。

「邊區」裏，據說並無檢查制度，但記者團發出的電信，交際處有專人負責查閱的，他看了以後，並不簽名蓋章，僅僅在稿上鈎了一筆，我們會問起這與檢查制度何異？有一位幹部黨員答道：這無非在幫助大家改正可能發生的錯誤，而不是檢查，團員中接到外來信件，大多是被拆閱過的，如問招待人員係何人所拆？他們的回答是：「不知道」，由於上述種種，使我們沒法在「邊區」自由地寫通訊，這於記者的職責是有虧的，但一個重視客觀事實的記者，於此實無能為力。

一個鮮明的對比 在延安看不見中國軍隊英勇作戰的消息，所見到的大都是失利和退却，延安告訴我們的是中共控制了多大的區域，有多少精兵，多少自衛隊，有一位記者告訴我們，延安的數字太多，很少有完全符合而無矛盾的，我們認為這位先生觀察是正確的

，因為外國記者的電報，對於紅軍數字，便是兩歧，有的說是二十萬，有的說四十萬，還有說不止四十萬，這些電報都已在海外發表了，可能增加關心中共的人更多的迷惘。

在延安住久的人，不會知道中央對於抗戰的努力，但在大後方的人，對延安一切，却大致了了，這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不發表的自由 有一位文化人（不是記者）告訴我們，『在重慶，我們所要求的是發表的自由，在延安，我們所渴望的，却是不發表的自由，無論參觀什麼所在，無論參觀如何疲勞，你得把你的感想，向組織公開，如果不這樣，便有人不斷地來探詢你，考核你，直到你說出了感想而後已。為應付這局面，有時不得不搜索枯腸，來一套感想。到現在我們才知道不發表也有自由，而這個自由，比前者更可貴』。有一次，本人病了，不能參觀，他們立刻派兩個醫生來診治，醫生都年青，只花了很少時間診脈，大半時間是作政治性的盤問。『本人弄巧成拙，想休息到反而更麻煩了』。

高級文化人辦活報 這位文化人又告訴我們，延安的文化人，無論修養的高下技巧的

優劣，一律服從組織，組織最近致力推行的，是『活報』即簡單的街頭劇，丁玲和其他很多優良作家，都不得不壓低自己的不法來編演這宗劇。因此，延安一般文人情緒是落漠的，但記者先生們當中，有些人認為這正是中共比我們強的地方，我個人同意這見解。

女性的自由 在組織命令下，女性也沒有自由，她們得爲組織去招待或慰勞任何人，在延安女性與男子的關係，有秘書，愛人，妻子三種，作用相同，但秘書不得生子，延安女性，一般說來，比大後方女性是緊張的，生產的，樸實的，她們雖然也講裝飾，但純爲愛美而裝飾者是很少的。

生產的情況 記者團和其他方面人異口同聲，一致贊許的，是邊區的生產，從數字和實質，看出他們的生產的確有效，可愛。對於邊區盛行的『勞動交換』制度，他們認爲雖然這是中國二千年來已普遍實行的制度，但是延安方面行得比較效率大，這還是組織力較強的緣故，以爲可以注意的還有下列二點：（一）從他們生產力『強』，並不能與『大』同日而語。須知道是手工生產，產量比起用機器要差上若干倍。（二）專論增加生產不

够，還要看增產的動機何在？如用在抗日或建國方面，這種增產，當然是極可欣慰的。

外籍記者的態度 有幾位先生告訴我們，他們相信外籍記者這次拍出的電報，對延安恐不免有些微詞，因為他們有好幾次表示憤懣，他們似乎比中國人更不易控制情感。

離開了邊區離開了邊區，他們有許多感想。趙炳煥先生曾親切觀察過保護線，證明其目的限於防禦，他並且說：延安控制區域，近的距西安只百多里，如果一無防範，西安隨時可以受擾亂。

對中共所行的制度，見仁見智，各有不同，大多數並不因持制度的形態，因為他們有因環境的自由，而着眼在其動機。

還有幾位先生以為中共最好也組織一些參觀團到外面來走走，因為處隔在一個地方，視野不廣，對於胸襟器識，都會發生影響，如果多看看世界，空氣自然會平些，心胸自然會闊些，疑忌自然會少些，以為人家要對付他們的念頭，也自然會被輕些。

西北參觀團在延安時

未能與老百姓談話

中共機構完全爲一地方性組織

▽……………盟利通訊社特輯

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歸來後，各方邀約講演及舉行座談會者甚多，筆者歸納中央日報、大公報、新民報、時事新報、國民公報等各報記者談話，擇其未在報上發表者，分述如次：（爲記述便利，以問題爲中心，綜合各記者談話作答）。

（問）赴延安參觀後，所得概括印象如何？

（答）延安黨政軍的機構和氣魄，完全爲一地方性的，決非能統治一國者。

(問) 延安教育情況如何？

(答) 延安教育的設施，不能以常情來觀察，中共完全利用為訓練工作人員的處所，不求高深，只是粗淺的灌輸一些常識和惑感民衆的手段，所以陝北毫無所謂學術空氣。

(問) 中共的政治動向如何？

(答) 毛澤東氏曾謂「現在是實行三民主義，並非無產階級專政，將來看民衆要什麼就實行什麼」？現時未能看出無產階級專政跡象，惟依其宣傳刊物而論，則其動向可想像得之。

(問) 邊區法律如何？

(答) 邊區法院設土審內，極簡陋。法官以調解為第一，有時親出調查，就地調解，非至萬不得已，不採仲裁辦法；但其仲裁之組織，名目甚多。

(問) 是否得與真正老百姓談話？

(答) 記者多在陝北，雖不能說有完全自由，惟於住所附近走動，亦尚方便，同行

記者有常往附近酒館買醉者，至欲與一老百姓談話，則絕無機會，實則即便談話，陝北語言，亦不易懂，鄉人見外客更有畏懼之態，而在途中奔波跋涉亦甚匆忙，故始終未獲機會，實深遺憾。至外籍記者是否得與鄉民談話則不得而知，惟即使獲有機會，想其間亦必經過一次「翻譯」。（談者於翻譯兩字，語音特重）。

（問）邊區婦女運動如何？

（答）邊區現已一反以前「那拉」型之婦運而提倡「賢妻良母」，將各鄉村出身之農婦，加以訓練，再入農村工作，鼓勵紡織，增加生產，因係農村出身回返農村，故工作較知識分子入鄉倡導更易收效。現在陝北農婦，因能紡織，經濟較前為佳。

（問）軍隊訓練如何？

（答）十八路軍着重游擊，戰術，朱德將軍亦云若欲轉為陣地戰之軍隊，最少尚須再加一年之專門訓練。在陝北曾參觀三五九王旅，旅長王震極強調抗日，而所參觀者則祇着重於生產，所有士兵均有手鎊，即王旅長亦以手鎊出示，足見其軍隊確是人人下地，至軍

隊之康健程度，依其面色而論仍非甚佳者，士兵伙食，其正軌軍尚佳。

(問) 中共內部情況如何？

(答) 中共內部情況如何？不得而知，惟陳紹禹氏確未晤見，據稱陳適在病中。

(問) 中共與蘇聯關係如何？

(答) 毛澤東氏謂只須看地圖，邊區無一處與蘇聯接界。此語極耐人尋味。

(問) 國共合作之展望如何？

(答) 自然極希望能合作，然恐接近亦非易事。但看解放日報常以蘇聯戰事刊首條，並於蘇軍攻克一地稱爲「光復」。而蔣委員長本年七七文告反未刊登，據稱電報收得不清楚。國內戰事登得不大，更絕未見刊在首題。中共對中央，係以友黨觀點出發，而非認爲中央與地方之關係，周恩來氏並謂中共係真心實行三民主義，只冀中央何時也實行，總區即時即取消，大有中央必須邊區化之意。

(問) 中共對國家統一問題如何解釋？

(答)中共認為惟有民主始能統一。至其所謂民主，並非吾人素知之英美式民主，而為工農兵聯合無產階級之民主。中共對民主之解釋，毛澤東氏於首次招待全體記者席上，曾有說明，翌日發為書面談話，刊在解放日報。

(問)中共之通俗宣傳？

(答)大多利用「秧歌隊」，以舊形式改編新歌詞。如重慶之一般話劇未見流行。利用千五百字之白話報，普及民間。其言論上下呼應極快，如某次反巫神，全區報紙一律痛斥，並召羣衆大會，迫巫神現身說法，自供全係騙人行爲。

(問)青年進入邊區情形？

(答)廿八年以後，青年已極少前往邊區，至邊區幹部湘籍佔多數，確係事實。

(問)西安勞動營如何？

(答)勞動營甚好，且公開招生，並有由勞動營出來在西京日報服務者。